



# FOCUS

# 高层动态

2021年3月22日

兰瑞智库  
经济战略研究

**指点江山**

**思入风云**

**菩提明镜**

**大道之行**

主办：兰瑞智库经济战略研究中心

<http://www.runwaysys.com>

全国客服热线：4001182162

E-mail: [runwaysys@163.com](mailto:runwaysys@163.com)

在中国的国情下，中央高层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中央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高层的决策？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

本报告力图提供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框架，将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从而达到把握最重要的决策要点的效果。

本报告力求提供的参考意见是有价值的，望您善加利用并慎重决策。



## 本期目录

<b>最新动向</b> .....	3
【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3
【习近平：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3
【李克强：扎实有力抓好落实推动经济稳中加固行稳致远】.....	5
【汪洋：进一步夯实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基础】.....	6
【王沪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成效】.....	7
【韩正：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有力有序推进各方面工作】.....	7
<b>问题探射</b> .....	8
【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加快深化改革】.....	8
【如何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	12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走势】.....	15
<b>人物关注</b> .....	19
【孙志洋任广东省副省长 周德睿、王旭任天津市副市长】.....	19
<b>智囊高参</b> .....	20
【郭威：2021年宏观政策调节需要处理好四大关系】.....	20
【赵晋平：科学谋划自贸区提升战略的实施路径和目标】.....	22
<b>虎视寰球</b> .....	25
【英国谋划“后脱欧”时代全球定位遭质疑】.....	25
【美日澳印“四边机制”面临多重挑战】.....	26
【难民潮再成土耳其与欧盟的烫手山芋】.....	28
<b>华夏透视</b> .....	30
【经济增长的张力从何而来：政治治理与经济转型】.....	30



## 最新动向

为什么要对中央高层的最新动向紧密跟踪？因为他们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对高端决策来说，高层动向的紧密跟踪是研究分析的关键性资源。

### 【习近平：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

3月16日出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文章强调，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兵。

文章指出，要充分认识到创新是第一动力，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着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要矢志不移自主创新，坚定创新信心，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

文章指出，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力激发创新活力。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优化和强化技术创新体系顶层设计。要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着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文章指出，要牢固确立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聚集人才，着力夯实创新发展人才基础。创新之道，唯在得人。要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使用机制、激励机制、竞争机制，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局面。（据新华社）

[Top](#)

### 【习近平：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3月15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研究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问题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基本思路和主要举措。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国平台经济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要着眼长远、兼顾当前，补齐短板、



强化弱项，营造创新环境，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要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拿出抓铁有痕的劲头，如期实现 2030 年前碳达峰、2060 年前碳中和的目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汇报，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关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举措的汇报。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地位 and 作用日益突显。平台经济有利于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技术和产业变革朝着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加速演进，有助于贯通国民经济循环各环节，也有利于提高国家治理的智能化、全域化、个性化、精细化水平。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好的、作用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平台企业发展不规范、存在风险，平台经济发展不充分、存在短板，监管体制不适应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会议强调，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从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高度出发，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把握平台经济发展规律，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明确规则，划清底线，加强监管，规范秩序，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国内和国际，促进公平竞争，反对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加强规范和监管，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形成治理合力。要加强开放合作，构建有活力、有创新力的制度环境，强化国际技术交流和研发合作。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促进平台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要健全完善规则制度，加快健全平台经济法律法规，及时弥补规则空白和漏洞，加强数据产权制度建设，强化平台企业数据安全责任。要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优化监管框架，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增强监管权威性，金融活动要全部纳入金融监管。要推动平台经济为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服务，加速用工业互联网平台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发展先进制造业，支持消费领域平台企业挖掘市场潜力，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供给。要加强平台各市场主体权益保护，督促平台企业承担商品质量、食品安全保障等责任，维护好用户数据权益及隐私权，明确平台企业劳动保护责任。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和引导平台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基础研究，夯实底层技术根基，扶持中小科技企业创新。要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会议强调，我国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关系，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引领，以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为核心，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要坚持全国统筹，强化顶层设计，发挥制度优势，压实各方责任，根据各地实际分类施策。要把节约能源资源放在首位，实行全面节约战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要坚持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强化科技和制度创新，深化能源和相关领域改革，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有效统筹国内国际能源



资源。要加强风险识别和管控，处理好减污降碳和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

会议指出，“十四五”是碳达峰的关键期、窗口期，要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控制化石能源总量，着力提高利用效能，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要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减污降碳行动，工业领域要推进绿色制造，建筑领域要提升节能标准，交通领域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运输方式。要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实现重大突破，抓紧部署低碳前沿技术研究，加快推广应用减污降碳技术，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要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完善能源“双控”制度，完善有利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价格、金融、土地、政府采购等政策，加快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积极发展绿色金融。要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反对奢侈浪费，鼓励绿色出行，营造绿色低碳生活新时尚。要提升生态碳汇能力，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有效发挥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冻土的固碳作用，提升生态系统碳汇增量。要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推进国际规则标准制定，建设绿色丝绸之路。

会议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硬仗，也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能力的一场大考。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起责任，做到有目标、有措施、有检查。领导干部要加强碳排放相关知识的学习，增强抓好绿色低碳发展的本领。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据新华社）

[Top](#)

### 【李克强：扎实有力抓好落实推动经济稳中加固行稳致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1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政府工作报告》重点任务分工，要求扎实有力抓好落实，推动经济稳中加固、行稳致远。会议指出，刚刚闭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对今年政府重点工作作出部署。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把责任扛在肩上，抓好政策落实，把政府对人民的承诺变成促发展、惠民生的新成效。会议将《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38个方面44项重点工作分解到国务院部门和有关地方，明确责任和完成时限。

会议指出，今年前两个月经济运行持续恢复，发展动力不断增强，但恢复进程仍不平衡，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一些地方经济恢复仍面临不少困难。要抓紧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确定的全年发展目标任务，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一是密切跟踪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及对我国影响，科学把握国内经济运行同比和环比态势，深入分析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实施政策预调微调，尤其要做好促就业、稳物价等工作，稳定市场预期。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巩固经济稳定恢复基础。二是抓紧已确定的财政、金融、就业等宏观政策落实。加快把扩大范围后的财政直达资金落到基层，突出用于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各级政府要坚持过紧日子，保障基层运转支出。抓实抓细针对小微企业的减税降费政策特别是新的结构性减税举措落地。尽快实施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政策，缩短结算期限，让企业当年有感。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政府杠杆率要有所降低。引导金融机构抓紧出台具体措施，做到小微企业融资便利度有提高、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



降。财政、金融等政策都要围绕增加就业协同发力。加强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和服务。发挥劳动力、人才、零工“三个市场”作用，拓展就业渠道。三是分解细化重点工作。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推出涉企审批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等具体措施。加快下达和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转移支付、地方政府专项债等资金，加强对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领域补短板的支持。出台支持县乡基层教师培训和在职提升学历的政策。抓紧出台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算、扩大门诊医保报销和常见病药品报销范围等措施。完善税费减免等政策，支持社会力量发展社区养老、托幼生活服务业等。四是加强对抓落实的督促检查。各地各部门要对照《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尽快制定本地区本部门实施方案，把各项工作往前赶。对跨领域跨部门跨地区事项，要加强协同配合。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据新华社）

[Top](#)

### 【汪洋：进一步夯实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基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近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领会好全国两会精神，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把握新疆工作形势，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对标对表与立足实际相结合、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全面推进与突出重点相协调，蹄疾步稳把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3月14日至17日，汪洋率调研组来到新疆，分成4个小组，赴乌鲁木齐、喀什、吐鲁番、哈密、克孜勒苏、昌吉等地，深入农村、社区、学校、企业、党政机关、科研机构、宗教场所等，与党员干部、专家学者、各族群众和宗教界人士开展“1对1”访谈，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工作汇报。汪洋指出，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紧扣新疆工作总目标，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反恐维稳斗争成果全面巩固，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得到显著加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新疆呈现出社会大局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成绩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惜。

汪洋强调，贯彻落实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要在事关长治久安的基础性工作上下功夫，在破解突出问题、补齐短板弱项上下功夫。要坚持依法治疆，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优化举措、精准施策，保持社会大局长期持续稳定。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做好民族工作，深化新疆地区历史研究，顺应各族群众意愿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以巩固去极端化成果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经学思想建设为关键，以加强宗教人才培养为支撑，以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为保障，引导新疆伊斯兰教更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找准新疆在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激发发展动能，坚定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探索符合新疆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要牢固树立“兵地一盘棋”思想，全力支持兵团深化改革和向南发展，促进兵地深度融合，更好发挥兵团维稳戍边作用。陈全国、尤权陪同调研。



(据新华社)

[Top](#)

### 【王沪宁：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成效】

党史学习教育用书出版座谈会暨专题宣讲动员会3月15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学好用好学习材料，深入开展专题宣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成效，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王沪宁表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广泛深入开展党史专题宣讲，坚持联系实际、用好红色资源、注重面向基层，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始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宗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长期奋斗铸就的伟大精神、成功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引导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黄坤明主持会议。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教育部负责同志作了发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中央宣讲团成员、学习材料编写组部分成员、中央宣传文化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中宣部部务会议成员等参加会议。（据新华社）

[Top](#)

### 【韩正：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有力有序推进各方面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3月16日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座谈会，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部署落实“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有关工作。

韩正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把握好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三个关键，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韩正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有力有序推进“十四五”各方面工作。要确保粮食安全，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优化能源结构，保障能源安全，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要关注重大社会政策问题，稳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健全全民医保制度。要解决好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大力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持续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继续推进重点行业去产能，提升产业链水平，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坚持发展和规范并重，建立健全平台经济治理体系。要增强工作敏锐性和前瞻性，善于发现苗头性、规律性问题，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



化解突出矛盾，牢牢把握住经济工作主动权。

韩正强调，要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紧紧围绕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进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提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水平，把文章做在“一体化”上。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把握好分步骤分阶段的实施节奏，稳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会前，韩正走进部分司局和处室，看望干部职工，了解“十四五”规划有关工作考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工作安排情况。何立峰参加上述活动。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主要负责同志作了发言。（据新华社）

[Top](#)

## 问题探射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问题将被高层关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问题的发展和解决方式将怎样影响相关问题和同类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影响我们的宏观环境？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本栏目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得我们对于高层动向的追踪变得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功能性，其方法对我们的决策分析具有启迪意义，也将极大提升我们的决策分析的利用价值。

### 【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应加快深化改革】

中央企业采取改组方式，已开展了第三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建议下一步改革应重点加强：进一步明确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使命，进一步理顺政企关系，加快试点企业的组织转型和能力建设，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加快建立管资本的新模式。

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的关键环节。该项改革既有助于推动国有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分离，实行国有资本市场化运作；也有利于建立专业化平台，促进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推动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

中央企业已经开展了第三批改革试点，各试点企业起点不同、条件不同，进展有快有慢，总体上看试点取得了积极进展，改革的目标逐步清晰，一些先行企业探索出重要经验，但同时也要看到，改革试点还未完全达到目标。中央企业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全部采用改组的方式，有的企业由于对改革的认识不够深入或者面临的环境条件不够成熟，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翻牌”现象，



具体表现为试点企业仍然沿用过去产业集团的体制机制，没有真正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设立是当前国资国企改革的枢纽环节，应成为一场涉及自身和各方关系的全面改革，建议下一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重点加强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 ■明确改革试点企业的使命

中央企业目前采取改组的方式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试点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成为国有资本布局调整的专业化平台，其使命也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从限定领域的产品经营向服务国家战略的资本投资转变。中央企业在制定改革试点方案时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一般都是基于企业过去形成的能力，结合国家战略需要，形成新的企业使命。多数企业都是由产业集团改组而来，新的使命基本都是在已有的投资领域内调整资本布局，促进所在行业提升发展质量。

以宝武集团为例，宝钢集团在 2010 年提出企业使命为：成为世界一流的钢铁产品、技术、服务供应商。开展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后，2019 年宝武集团提出，以“成为全球钢铁业引领者”为愿景，以“共建高质量钢铁生态圈”为使命，构建在钢铁生产、绿色发展、智慧制造、服务转型、效益优异等五方面的引领优势，打造以绿色精品智慧的钢铁制造业为基础，新材料产业、智慧服务业、资源环境业、产业园区业、产业金融业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格局。

在试点阶段，由试点企业以自身能力为基础提出企业使命的做法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既尽可能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也可降低跨领域投资的风险。但是，国家层面还应有个总体优化布局的考虑，需要尽快制定国有资本布局调整的总体规划，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明确使命提供指南。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明确国有资本布局调整的基本原则：“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一些地方也制定了明确的目标，如上海提出，“十三五”末争取 85% 国资布局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等四大领域。

在国家层面，如何用好庞大的国有资本，更好地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需要国家相关部门从战略层面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国有资本未来投向的主要领域及大致比例，并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市场化调整国有资本布局的主体。例如，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持有的资产进行大致分类，结合国家的五年规划对未来资产结构提出指导性意见，由企业根据市场环境和自身需要进行逐步调整。二者相互配合，才能真正将国有资本布局调整的目标落到实处。

### ■进一步理顺政企关系

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是当前国资管理体制存在的突出矛盾，政府与企业之间权责边界不清晰，国有资产监管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依然存在。实现“政企分离、政资分离”，既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目标，也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有效运转的前提条件。在当前的试点过程中，国资委采取了“一企一策”的方式对试点企业放权授权，推动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例如，在 2016 年中粮集团的试点方案中，国资委向中粮集团在资产配置、薪酬分配、市场化用人、体制改革、主营业务范围确定等 18 个事项进行放权授权。放权授权的重点是减少对集团下属企业的直接干预，让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能够有效运转，具体事项包括：公司内部企业之间的产权无偿划转；通过产权市场转让国有产权，子企业增资，公司及子企业重大资产处置事项；在法律法规和国资监管规章规定



的比例或数量范围内，增减持上市公司股份事项；不涉及控股权变动的情况下，上市公司股份的协议受让。国资委放权授权的这些事项，都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独立市场主体和专业化平台有效运转的基本条件。

为了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国资委自身也在加大改革力度，对中央企业不断放权，减少对企业直接干预，这些措施也有利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改革试点。2019年6月，国资委发布放权授权清单，重点选取了五大类、35项放权授权事项，包括规划投资与主业管理（8项）、产权管理（12项）、选人用人（2项）、企业薪酬与激励（10项）、重大财务事项管理（3项）等。除去针对特定企业的4件事项，31项都给予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另外，2018年底确定的11家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还获得了个别事项的放权授权。这些重要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总结和借鉴了前期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的成功经验。

虽然国资委不断加大放权授权的力度，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试点创造了良好条件，但试点企业普遍反映，包括国资委在内的政府部门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的力度。一是按照“政府正面清单、企业负面清单”的原则，依照《公司法》和《企业国有资产法》进一步划清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责边界。政府放权授权改革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出台政府部门的权责清单，进一步规范政府部门职责权限，做到“有权必有责”“清单之外无职权”“法无授权不可为”。二是随着产业集团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转变，应重新界定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责任要求，不宜将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与其投资企业完全当作一个整体进行考核。产业集团总部对下属企业可以实行多种形式的管控，集团总部有必要也有能力对集团下属企业承担领导责任和考核指标。产业集团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后，依照公司法行使股东权力，应减少甚至取消对持股企业的直接管理，让持股企业成为独立市场主体。作为股东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只须以其出资额或所持股份为限对持股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如果不减少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责任要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就无法减少对持股企业的直接管理，也就无法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

### ■ 加快试点企业的组织转型和能力建设

中央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绝不是简单翻牌，而是重大的转型，转型的基础是总部机构改革和能力建设。从试点情况看，一些现行试点企业开展了积极探索，在目标上基本形成了共识，在行动上也迈出了较大步伐。

例如，中国诚通从产业集团向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转变，对总部进行重组，将总部部门分为前、中、后台，前台部门承担股权融资、股权管理、金融理财等资本运营核心业务，中台部门承担战略研究、风险控制、综合协同等任务，为资本运营提供有力支撑，后台部门在党建、廉洁监督、人力资源、综合服务等方面为资本运营和价值创造提供基础保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将总部改革作为试点的突破口，按照“重心下沉、激发活力、重组整合、重塑职能”的改革思路，完成了总部改革，构建了“小总部、大产业”的管理架构，总部职能部门由14个减为9个，处室由56个减到32个，管理人员控制在230人以内。中粮集团为了适应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按照“小总部，大产业”模式，重建集团总部，负责国有资本的配置与监管，资产运营职能全部下放至专业化公司，集团总部职能部门从13个压缩到7个，人员从610人调整至240人左右。这些试点企业探索的成功经验，为后续试点企业提供了重要参考。

部分试点企业搭建了新的投资平台，用市场化手段实现国家战略。产业基金



是重要的投资工具，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将资本交给专业性的一般合伙人管理，依靠专业人才和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投资效率，弥补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短板。

以国投为例，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组建 5 家基金管理公司，不追求绝对控股，国有资本只占 40%，引导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和治理。基金管理层全部“脱军装”，成为市场化选聘的职业经理人。5 家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资金 1600 亿元，超过 70% 都投向了民营企业，直接、间接地支持 2000 多家民营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依靠新的投资工具，国投在转型发展上迈出重大步伐，传统产业资产占比下降到 45%，金融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上升到了 55%。新的投资平台帮助国投从一家资源型、基础产业为传统的传统投资公司，转变为一家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基本实现了新旧动能转换。

从客观上看，在组织转型和能力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的还只是少数基础较好的先行试点企业，多数试点企业还在沿用传统产业集团的组织结构和流程，还没有建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基本能力和投资工具。对于少数领先企业而言，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提升管资本的能力，全面向管资本转变，包括：全面取消对投资企业的行政性管理，以出资人的权利为界限积极参与投资企业的公司治理；根据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加强国有资本布局调整的力度，提升国有资本对经济社会高质量的支撑力。对于多数试点企业而言，应借鉴先进企业的重要经验，加快企业转型，包括：重组集团总部组织结构、流程，调整人力资源结构，重塑集团总部的职能，逐步减少对下属企业业务的干预，大力加强管资本的能力；完善投资平台，加强前中后台建设，充分利用产业基金等市场化投资工具，全面建立“募、投、管、退”的流程，从生产经营型管理模式向管资本的模式转变。

### ■ 建立管资本的新模式

对于改组设立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而言，建立管资本的新模式，涉及两个层面的改革：一是下属出资企业的改革。推行混合所有制，完善公司治理，使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二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其出资企业管理方式的改革。对下属出资企业从行政式管理向出资人参与公司治理转变。两项改革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一些改革试点中央企业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以国投为例，国投对下属子公司进行重新评估，根据混改和公司治理的情况，将子公司划分为充分授权、部分授权、优化管理三类。其中，对于国投电力、国投高新开展充分授权试点，总部除保留体现股东权责、有外部监管要求的事项外，选人用人、自主经营、薪酬分配等 70 多个原来由总部决策的事项“应放全放”。在放权授权改革中，国投同步推行股权董事制度，总部派出董事由兼职改为专职，通过专职董事、股东会等工具参与出资企业的公司治理。

客观地讲，多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还没有建立管资本的新模式。这既与改革的复杂性有关，也与试点企业的能力有关。下一步改革应从两个方面同步推进：一是大力推进下属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宜参则参、宜控则控，优化股权结构，推动企业体制机制改革。重点推进业务板块重组上市，为完善公司治理、实施员工持股等中长期激励、推动体制机制转变、调整国有资本布局等改革创造更好条件。二是根据下属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稳步推进管理模式改革。对于股权结构合理、公司治理比较完善的下属企业，应尽可能取消除股东权责之外的管理事项，让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对于目前公司治理还不太完善的下属企业，



应在加快改革的同时，逐步加大放权的力度。

试点企业减少对下属出资企业的行政性管理，并不是撒手不管，而是要依法参与公司治理。为此，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必须大幅提升管资本的能力，包括：加强战略研究，为国有资本管理和运营提供支持；建设专业队伍，从业务运营管理人才为主转变为投资运营管理人才为主；建立科学流程，根据投资和资产管理不同事项，建立新的业务流程，保证决策的及时性和合理性；利用新的管理工具，建立分类管理制度，充分利用参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制度机制，提升资本管理能力。试点企业从行政性管理下属出资企业转变为依法参与出资企业的公司治理，不仅有利于激发下属企业的活力，还有利于增强外部监督的独立客观性，以及集中精力开展资本布局调整，真正实现国家赋予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历史使命。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作者：马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Top](#)

### 【如何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

现在提出的财政政策叫“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可持续”。这里面有几个关键词：财政政策要积极、提质增效、可持续。看起来和以往的表述差别不大，实际上还是有差异的，特别是强调了可持续，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度、有分寸。

#### 一、财政政策的目标

这三个关键词围绕着一个目标：对冲公共风险。分析当下的经济形势时离不开疫情。疫情在中国得到了有效控制，从全球情况来看也在逐步好转。疫情对经济带来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不太一样。如果把疫情看成短期因素，那么我们探讨政策时考虑它的短期影响就行；如果把疫情当成长期因素，那么经济运行和政策的内在逻辑可能要发生调整 and 变化。从这点来看，还是要回到疫情上。现在关于疫苗和特效药的各种消息接踵而来，涉及到公共风险和确定性问题。只有在疫情方面有了特效药和有效疫苗，才能给全球构建确定性，给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构建确定性。这是最重要的。

从去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到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上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呢？从对冲风险的角度来看，去年的首位风险是公共卫生风险，也就是疫情的风险。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减少疫情衍生的经济社会风险，所以去年发行了抗疫特别国债，将赤字提高到3.6%以上，都是为了对冲疫情风险；同时，政府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采取了一些保底政策，从2019年“六稳”变成2020“六保”。财政方面也有小“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发放、保基层财政运转。2020年，用政策对冲公共风险的重心放在疫情方面，兼顾其它风险。去年的财政政策反映出明显的特征，即对疫情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民生风险和外部风险等各种风险进行权衡和排序，通过风险排序来确定财政政策的重心和首要目标。

今年，全球疫情在收敛，中国疫情也得到有效控制。这次疫情不像非典那样，几个月时间就过去了。目前疫情已经暴发了一年，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存在衍生风险。不过，疫情风险现在已经不是首位风险了，首位风险转移到了经济社会，即怎么让经济尽快恢复，为就业和收入增长创造条件，从而稳定社会。换句话说，对冲经济和社会风险放在了更重要的位置上，这意味着财政政策从目标到



内容都会做出一些调整。所以，调整财政政策的内在依据是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共风险或宏观的风险结构进行调整。从目标来看，财政政策的调整体现了对冲风险方面的变化。经济社会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济增长。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理解经济增长，过去的经济增长和现在的经济增长不一样。从社会财富积累的角度来看，从存量与流量的关系来看，经济增长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社会财富的角度来观察，现在财富增长快于 GDP 增长。GDP 是流量，财富是存量。经济增长是以社会财富来生产社会财富，存量带来流量。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经济增长，那就要看存量的规模，经济学讲的是资本的积累。从现代经济金融学的角度来看，资产配置和资产组合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高低。我们所说的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体现了资产配置的效率或者资产组合的效率。

中国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 1 万美元，背后的含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财富存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如何盘活存量。如果不能有效地配置和使用财富存量，那么存量带来流量、资产带来收入的效率就会下降。现在我们需要越来越多投资才能带来一个单位 GDP 的增长，资产配置效率是下降的，可能最重要的是如何用财政政策来撬动资产配置效率。从资产角度观察经济增长和财政货币政策，与基于流量分析来观察经济形势、讨论财政货币政策的传统方法存在很大差异，采用的理论逻辑和分析框架不一样，目标也会有变化。

### 二、如何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这些年的基调。从 1998 年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到现在，其中只有很短时间提过中性的财政政策。怎么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呢？积极财政政策就是扩张的财政政策，表现为要有赤字，而且赤字要增加。如果赤字率上去了，人们就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比较大，更加积极；如果赤字率下来了，大家判断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在缩小。债务增加同样成为判断积极财政政策力度的指标。但我们讲到赤字的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究竟什么是赤字？看起来这是一个不该提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些年来赤字成了常态化。既然赤字成了常态化，那么从赤字回到收支平衡，从过去的年度赤字政策到跨周期的赤字政策等，这些说法在当前新的条件下就难以成立。既然可以采取长期的赤字政策，导致债务长期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恐怕就要对我们的理论和原有的分析框架做一些调整。我们现在讨论赤字时，是不是潜意识里把它当成政策手段和政策工具的权宜之计？有人认为现在赤字高一点是必要的，可以对冲风险、扩大需求。也有人看法不同，认为赤字过大可能导致财政风险扩大和财政不可持续等问题。实际上这涉及到财政政策基准的问题。从会计账户的角度来看，收支平衡似乎是中性政策。如果财政有赢余，那就不是扩张，而是在紧缩。现在再以财政收支平衡作为基准来判断财政赤字水平和财政风险是不是恰当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因为赤字也需要重新定义。既然赤字可以常态化，那么是不是要基于会计账户的平衡概念来定义赤字？这个问题也需要探讨。

我们要如何认识赤字导致的债务？过去欠下的债务要归还，所以从传统债务的角度来看，这个定义没有错。我们需要在不同条件下深入地研究债务。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国债和地方债等属于政府债务，但是从其他部门的角度来看，政府的债务又变成了资产，因为目前我们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出现零利率，这些债务能获得收益。现在政府发债，在一定意义上是给经济提供资产，从金融的角度来说是提供金融工具。如果用收支平衡的理念来看，若赤字没有了，政府也没有必



要发行债务，国家收益率曲线的基准可能就会消失。站在财政的角度，债务是弥补赤字的一个工具。如果财政没有需求，债务发行就少了，结果导致市场金融工具和流动性工具不足而引发问题。由此可见，发行短期国债不是为了财政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金融市场的需要。政府债务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债务。它的内涵和功能发生了很大变化。

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来看，政府是作为一个部门来看待，其它部门有金融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等。政府的债务对其他部门来说是资产。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债务跟其他部门的债务含义不一样。我们以前常常讲四个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把它们等量齐观来看待。我觉得这么做可能存在一些问题。金融部门、央行、政府、居民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不是同质的。

对银行来说，银行的资产实际上变成了企业的债务。银行资产收益率越高，意味着实体企业的成本越高。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简单地认为银行资产收益率越高，金融体系就越安全。如果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关注资产组合和经济增长，那么要从其它角度分析不同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经济含义以及它们带来的不同风险。从风险结构和宏观资产结构来看，不同部门的资产和债务的含义是有区别的，不能同质化对待。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的理论框架恐怕也需要进行调整，需要摆脱不适当的传统观念。

利率变成零的时候，发行货币或政府发行债务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差别。从一般意义上理解，货币是央行对国民的负债，实际上也是国家对国民的负债。政府发行债券也是如此。所以，一旦出现零利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原有的关系就发生了重大转换。财政和货币政策相融合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货币既可以看成负债，也可以看成资产。我们可以列一个资产序列清单：现金是典型的货币，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国库券、股票、债券、房产、企业设备等都可以列入这个资产清单。这个资产清单越往上货币性越强，从现金到债券可以说是金融资产，从房产到企业设备可以看成是实物资产。按照包容性财富的概念，还可以把人力资本包含进来，即人力资产。从这点来看，宏观资产结构和宏观资产组合与微观资产结构和微观资产组合的对象是一样的，只不过从宏观来看和从微观来看，看到的结果不一样，对应的风险结构也不一样。所以，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可以当成资产来使用。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很多东西就变了。比如企业用现金购买原材料和机械设备，这种变化实际上是资产结构的变化，从资产的角度来说只是形态发生了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会带来收益。这里讲的收益是内部收益率。内部收益率从微观来说是财务收益率，从宏观来说是经济收益率。经济收益率反映的就是经济增长率，财务收益率是企业资产的增值率。经济增长就是资产的增值。从这个意义来看，两者的匹配性决定了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潜力，所谓潜在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都是蕴含其中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问题和实体经济问题实际上是统一在一起的，不是两张皮的概念，也不是二元分析框架。所以，从这点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很多方面是相通的，甚至是一体的。

讲到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理解它时要摆脱传统的凯恩斯框架。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通货膨胀。刚才说到货币也是一种资产，是不是说货币越多越好？任何真理都是有条件的，真理向前一步就变成谬误，很多东西不能绝对化。赤字货币化是有条件的，任何规律都是有条件的，不谈条件谈规律等于没有意义，不谈条件谈真理等于没有真理，我们有时候讨论一些问题把它推到极致，极致化讨论等于没法讨论。赤字货币化是一种现实，不是理论上承认不承认的问题。



### 三、财政政策如何提质增效？

怎么理解提质增效？一方面指资金配置和使用的有效性。从财政意义上理解，就是在经济层面和社会层面把钱花在刀刃上。另一方面指政策有效性。这里面涉及“财”和“政”。“财”是讲资金，“政”可以理解为政策，可以理解为政治，也可以理解成政权。财政政策不是简单地拿钱，把钱用好，更重要的是实现政策的有效性。怎么衡量政策的有效性？我们可以用预期的改善情况来判断。如果经济社会主体的预期改善了，那么政策就是有效的，风险就是收敛的。如果预期没有改善，那么风险可能扩散，预防性的动机就会增强，表现为投资、消费、市场主体的行为收缩，不利于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从这点来看，我们可以从预期确定性程度的角度判断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我们现在说的最多的一个概念就是不确定性。确定性表现在哪里？如果经济社会主体的预期改善，大家安下心来该干嘛干嘛，那么他就有长期打算了。不确定性越大，越没有长期打算，短期可能都会停摆。因此，我们要用预期判断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而不是把钱花出去了事。按照凯恩斯理论，一部分人挖金币，一部分人埋金币，这个过程看起来很可笑，但是也能带来 GDP 增加。这种理论推导在逻辑上没有问题，但在现实中很可笑，恐怕谁也不会干这种事。预期改善是最重要的指标或判断的基准，反映出公共风险的收敛情况。

### 四、如何实现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

有些观点认为财政政策的空间小，无非是说财政风险在扩大。这是基于传统分析框架看到的。传统分析框架认为赤字缺口增加意味着债务增长，但财政不可持续的问题不是债务本身，而是利率高低，如果利率为零，那么财政的可持续性就不是问题。为什么《马斯特条约》规定欧洲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过 3%、债务余额不能超过 60%？这是基于当时的高利率。在当时的利率水平下，财政是不可持续的，风险会继续扩大。为什么欧洲国家和美国的赤字越搞越大，却无所畏惧？按照传统观念来看，它们的财政不可持续，但它们的利率几乎为零，等于政府无成本融资，那就具备可持续性了。利率是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汇率、税率等一系列经济参数都会影响资产的增值率，影响财政风险大小和财政的可持续性。

去年的利息支出估算在 16000 亿元左右，在财政支出里是除教育支出之外的第二大支出。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带来的财政负担非常重，首先就是要支付利息，给财政可持续性带来很大问题。我们讲财政可持续，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风险结构已经在变化，但我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而是用老理论、传统观念和路径依赖形成的分析框架分析它们，甚至还把赤字率不能超过 3%、债务不能超过 60% 当做金科玉律来认可，认为达到这个点就超过社会心理承受的临界点。理论界的这种看法直接和间接影响了宏观政策。确实需要从理论创新上支持政策创新，否则政策的路径依赖就很严重。

*（来源：财新网，作者：刘尚希，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Top](#)

## 【中美贸易摩擦与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走势】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和供应链稳定的影响引发广泛关注。美国对中国大量输美商品征收高额关税，一个重要动机是利用关税手段，诱导美国制造业企业回流本土，推动中国制造业外迁产能，削弱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地位，打乱中国在高端制造业、科技领域的追赶节奏和步伐。为监测中



国制造业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态状况,我们综合利用 FDI Intelligence 的绿地投资数据、BVD 的跨境并购数据和官方的对外投资数据,分析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国别分布和行业结构。

### 一、投资规模波动下行,但绿地投资规模呈增长态势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在全球经济低迷和跨境直接投资规模大幅下滑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低速下降态势,但总体稳定,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出现震荡下行态势。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前11个月,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规模分别为1213.2亿美元、1169.6亿美元和950.8亿美元,同比依次下降0.3%、3.6%、3.1%;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分别为191.1亿美元、202.4亿美元、157.6亿美元,同比增长-35.2%、5.9%、-15.1%(年化增长率),占中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的比重依次为15.8%、17.3%、16.6%。中国制造业企业在2019年对外直接投资之所以能实现逆势增长,除寻求低成本的投资目的地和拓展海外销售市场等原因外,一个重要的推力可能是规避美国加征的高额关税。2020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的下降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疫情影响,中美经贸摩擦所起的作用较小。

另据 FDI Intelligence 和 BVD 的数据,2018—2019年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流量虽波动下行,但占中国对外投资的份额却震荡上升。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先由2017年的410.1亿美元略升至2018年416.8亿美元,增长1.6%,后降至2019年的385.7亿美元,跌幅为5.9%。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所萎缩的背景下,制造业占对外投资的份额波动上升,先从2017年53.9%降至2018年的44.9%,后大幅升至2019年的65.2%。这意味着,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步伐确实有所加快,明显快于其他行业。

在全球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中国制造业对外并购投资规模大幅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规模出现逆势稳定增长态势。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规模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和过程中均稳步增长,先由2013年的145亿美元快速升至2014年的243亿美元,2015—2016年回调至210亿美元左右,2017年跨越300亿美元的关口升至3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7%,2018年略降至297亿美元,跌幅为6.0%,后于2019年创历史新高,达372亿美元,升幅为25.3%。

与以产能转移为主要特征的绿地投资的稳定增长形成鲜明反差,以寻求技术和战略资源为主要动机的中国制造业对外并购投资额大幅波动,先由2017年的94.6亿美元升至120.2亿美元,增长27.1%,但在2019年骤降至14.0亿美元,跌幅达88.4%,呈断崖式下跌态势。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经济大幅衰退和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等因素的影响,市场观望情绪浓厚,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继续放缓。据安永发布的报告,2020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宣布的海外并购数量371宗,同比下降21.1%,海外并购总额244亿美元,同比下降50.6%。其中,先进制造与运输业并购案51宗,同比下降35%,并购金额29.6亿美元,同比下降10%。这表明,在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和科技竞争的叠加影响下,中国制造业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投资阻力显著上升,从而,中资企业越来越难以通过跨国并购来提升技术水平,而必须通过自主研发来促进技术进步。

### 二、电子、通信和汽车等受关税影响较大行业的对外绿地投资明显增长

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主要分布于金属、化石能源、化工、汽车、纺织、橡胶、电子、食品和烟草、造纸包装、通信等资源或劳动密集型行业。中美贸易摩擦以来,金属、化石能源、电子和通信行业的对外绿地投资规模增长,而化工、



纺织、橡胶、食品和烟草、造纸和包装的对外绿地投资规模下降。电子、通信行业的对外绿地投资规模波动上升，先由2016年的23.4亿美元、10.7亿美元分别跌至2017年的11.6亿美元、0.7亿美元，2018年反弹至23.3亿美元、7.1亿美元，2019年进一步升至37.4亿美元、16.6亿美元。汽车OEM及零部件、化工行业的对外绿地投资也经历了一个先跌后升过程，分别先由2017年的58.4亿美元、79.6亿美元跌至2018年的32.2亿美元、3.3亿美元，后反弹至2019年的50.8亿美元、34.5亿美元。金属冶炼、纺织行业对外绿地投资规模的波动幅度大，在2018年分别达峰值的113.7亿美元、33.9亿美元，2019年跌至36.5亿美元、16.9亿美元（见表1）。其中，金属、汽车、电子和通信等行业有多种商品列入美国的征税清单，受美国加征关税影响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环境出现了较大不利变化，制造业境外并购投资明显受阻。2018年，贸易摩擦爆发对中国企业对外并购投资的影响不明显。2019年，美国和欧洲国家先后出台了更为严格的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控措施，中国企业对外收并购投资出现断崖式下跌。其中，中国在机械、装备等工业制品行业的对外并购投资降至零，而该行业包括电子、汽车和装备制造业，技术含量较高。

### 三、对越南、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投资强劲上升，对欧美发达国家的并购投资断崖式下降

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具有突出的区域特征，绿地投资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跨境并购投资基本分布于发达国家。贸易摩擦以来，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绿地投资呈稳定增长，对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绿地投资和并购投资均快速下降。从表2可见，中国对俄罗斯、印度、越南、巴西和墨西哥的制造业绿地投资总额由2017年的52.9亿美元，升至2018年的56.2亿美元，2019年进一步攀升至211.9亿美元，但对其并购投资额接近零。中国对美国、德国、英国和法国的制造业绿地投资合计额先由2017年的71.5亿美元，降至2018年的16.1亿美元，后回升至2019年的37.4亿美元；中国制造业对其并购投资额大幅下跌，先由2017年的48.5亿美元，大跌至2018年的16.2亿美元，2019年则基本为零。这表明，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企业对欧美发达国家制造业技术寻求型的并购投资门槛急剧抬升，投资规模呈现断崖式下跌。

中国对越南、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制造业投资出现强劲增长，投资份额大幅跃升。部分人力和自然资源较丰富、经济开放度高、经济发展潜力大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中国制造业对外绿地投资的主要目的地。2018年，中国对印度、越南和巴西制造业投资规模分别达34.4亿美元、8.6亿美元和4.1亿美元，依次增长2.2倍、2.8倍和0.8倍。2019年，中国对越南、巴西和墨西哥制造业的投资额分别为32.2亿美元、17.9亿美元和11.7亿美元，依次增长2.8倍、3.4倍和5.4倍；中国对印度制造业投资规模为27.9亿美元，虽下降18.7%，但仍为2017年的2.6倍。中国对越南、印度、巴西和墨西哥制造业投资占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的份额迅速攀升，由2017年的6.4%升至2018年的11.7%，2019年进一步升至23.3%。

201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和欧洲对外资的管制逐步收紧，极大影响了中国企业对欧美的投资特别是并购投资。中国对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呈断崖式下跌，投资受阻现象明显。中国对发达国家制造业投资额由2017年的168.0亿美元降至2018年的134.3亿美元，2019年进一步跌至72.4亿美元，占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的份额由2017年的41.0%逐步降至2018年的32.2%和2019年的18.8%。美



国和德国是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中国对美国的制造业投资规模由2017年的52.2亿美元跌至2018年24.6亿美元，降幅达52.9%，2019年进一步降至16.7亿美元，下跌32.1%。中国对德国制造业的投资规模由2017年26.9亿美元降至2018年4.7亿美元，降幅达82.5%，2019年虽回升至17.7亿美元，但仅有一个绿地投资项目。其中，2018年，中国对美国、德国的制造业并购投资出现大幅下降，分别由上年的27.7亿美元、13.2亿美元降至14.3亿美元、11.9亿美元，降幅分别达48.3%、91.0%。在欧美相关法案出台之后的2019年，中国对美、德制造业企业的并购活动基本停止。

#### 四、外资制造业企业出现隐性外迁

外资制造业企业外迁产能有显性和隐性两种方式。显性外迁表现为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撤资和向外搬迁工厂。隐性外迁有两种方式：一是跨国公司的转移订单行为。外资制造业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虽未撤资，但可将订单转移至国外已有的子公司或兄弟公司。二是外资企业停止和削减对华新增投资。外商来华直接投资减少，也是制造业的一种潜在损失。

生产订单转移的现象在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前就已存在。如，对纺织行业而言，越南作为美国第二大纺织品服装进口市场，具有产业配套相对完善、生产成本低、劳动力充裕等优势，最有可能承接来自中国的订单转移。在自行车行业，中美贸易摩擦爆发后一些国际品牌商也存在转移订单的现象。如，崔克（Trek Bicycle）自行车公司、肯特国际（Kent International）自行车公司为了规避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加征的关税，将原有在中国的订单转移至柬埔寨工厂进行生产并出口。另据一项调研，一些在华外资企业主要采取转移订单而非撤资的方式来外迁产能，将原本属于中国工厂的订单转移至东南亚等国。

制造业外迁的另一种隐蔽形式是外资企业停止和削减对华新增投资。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跨国公司出于分散产业链的考虑，适当增加对东盟、南亚和拉美等地的投资，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度。目前，一些在华外资投资企业虽有一定的外迁意愿，但中国制造业对外资仍具有较大吸引力。外资企业对制造业的绿地投资在2015—2017年期间维持高度稳定，均值约为277亿美元，2018年急剧升至731亿美元，2019年虽降至351亿美元，但明显高于前些年的水平。新冠疫情打破了美国政府的中美经贸脱钩和国际产业链“去中国化”的如意算盘。制造业企业外迁产能的意愿已显著降低，这从中国吸引外资规模持续逆势攀升可得到验证。据商务部数据，2020年，中国非金融部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43.7亿美元，同比增长4.5%，创历史新高。其中，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额同比增长13.9%，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同比增长11.4%。不过，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制造业产业链可能加快出现区域化、多点化的特征，中国面临的产业外迁压力可能会上升。

（来源：《经济纵横》2021年第2期，作者：王永中，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学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Top](#)



## 人物关注

毫无疑问，人是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那么，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中央高层的决策？哪些人会特别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这些人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倾向是什么？这些特征如何影响事态发展？他们怎样影响中央高层、怎样影响周边环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物分析将有助于揭开复杂事物的真相，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 【孙志洋任广东省副省长 周德睿、王旭任天津市副市长】

#### 孙志洋任广东省副省长 原任中国一汽副总经理

据广东“南方+”客户端消息，3月18日下午，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决定任命孙志洋为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孙志洋，男，1974年5月生，吉林扶余人，199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吉林工业大学汽车拖拉机专业本科毕业，工学学士，吉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此前担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据广东“南方+”客户端）

#### 宋福龙任广东省监委代主任 原主任施克辉已赴国务院港澳办任职

据广东“南方+”客户端消息，3月18日下午，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决定任命宋福龙为广东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宋福龙代理广东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宋福龙，1964年8月出生，曾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交通运输部纪检监察组组长、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近日已任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原任广东省监委主任的施克辉日前已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纪检监察组组长、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党组成员。（据广东“南方+”客户端）

#### 周德睿、王旭任天津市副市长

据天津人大微信公众号消息，3月15日，天津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任命周德睿、王旭为天津市副市长。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周德睿，男，1966年2月生，此前担任湖南省常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旭，男，满族，1970年6月生，此前担任商务部美洲大洋洲司司长。（据天津人大微信公众号）

#### 内蒙古党委常委张恩惠调任吉林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据《吉林日报》消息，3月15日，吉林省委组织部召开干部大会，宣布中央和中组部有关人事安排的决定。经中央批准，张恩惠同志任中共吉林省委委员、常委。根据中组部有关意见，张恩惠同志任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张恩惠，1966年12月出生，长期在内蒙古自治



区任职，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局长，兴安盟盟委书记，去年2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原任吉林省委组织部部长的王晓萍去年底已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据《吉林日报》）

[Top](#)

## 智囊高参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在中南海内外，活跃着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他们为中央高层出谋划策，并有意无意地向外界释放思想、建议、政策措施等相关信息。关注他们的观点、建议和动向，就好像“更上一层楼”，可“穷千里目”。

### 【郭威：2021年宏观政策调节需要处理好四大关系】

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众志成城、团结奋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加大宏观政策应对力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疫情防控形势已进入常态化阶段，各地复工复产逐步好转，经济也呈现向好趋势，但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和冲击仍在持续，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到心中有数，积极应对，清醒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复杂性，增强统筹抓好各项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疫情防控，关系到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到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十三五”规划。辩证地看，两者紧密相连，既对立统一，又可以相互转化，既要在恢复经济社会发展中，全力避免疫情扩散和反复之“危”，又要在疫情有效控制条件下，积极把握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之“机遇”，两者必须统筹兼顾，协同推进。但“危”与“机”不会自动完成转变，需要主动作为，积极有为，在促使两者转变的诸多因素当中，科学稳健把握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是关键一环。宏观政策重在逆周期调节，节奏和力度要能够对冲疫情影响，防止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化。对此，同样需要坚持辩证思维，以偏概全、顾此失彼均不可取，主要应当处理好总量与结构、当前与长远、供给与需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对于提高我国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也具有积极意义。

#### ■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处理好总量与结构的关系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影响范围看，虽然疫情的冲击波及全国各个区域、产业和各类企业，通过加剧工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



生产经营困难、延缓投资项目建设进度、抑制内外商务经贸活动、加大稳就业压力等途径给我国宏观经济带来总量性增长压力，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同领域和环节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特别是随着疫情发展阶段的演化，各地的疫情防控形势和复工复产工作逐渐呈现结构性分化特征，因此，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绝不是单纯搞“大水漫过”“一涌而上”，而是要在适度的总量性政策的基础上着重采取结构化的政策措施，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一方面，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有为，在已经出台财政贴息、大规模降费、缓缴税款等政策的同时需要进一步研究出台更具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政策，加大对农业、制造业、旅游和服务等特定产业、湖北等防疫重点地区以及低收入、残障等特定群体的财政支持力度；另一方面，稳健的货币政策应更加注重灵活适度，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基础上，重点加大疫情影响严重地区、行业 and 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强化对先进制造业、新兴战略产业、脱贫攻坚以及惠及民生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充分发挥好专项再贷款、再贴现以及政策性银行专项信贷在帮扶民营和中小微企业中的积极作用。

### ■坚定信心，审时度势，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不可避免会对经济社会造成较大冲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我国发展，越要增强信心、坚定信心。总体来看，此次疫情是典型的外生变量，其所形成的冲击终归是外生性冲击，短期的冲击不会改变我国经济的内生活力和韧性，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长期稳中向好的趋势性特征。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有效防控，放缓的宏观经济便会回归到正常的轨道运行。因此，在宏观政策安排上，既要立足当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守住经济增速底线，更要着眼长远，注重产业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生物医药、5G网络、智能制造、无人配送、在线消费以及远程教育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只有宏观政策运用得当，长短结合，才可化“疫情”之危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之机，维持住我国经济提质增效的结构性变化趋势。无论何时，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都是应对挑战，抢占先机的关键和根本，有利于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接续性和稳定性，而在短期内单纯追求经济恢复的总量性宏观经济政策被事实证明可能会带来短期的改善，但终究会引发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杠杆率攀升等风险问题而不可持续。

### ■相互配合，协调推进，处理好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综合分析，当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有周期性、总量性的，但主要是结构性的。结构性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仍在供给侧。此次疫情虽然率先对我国经济从消费、投资和进出口等需求方面形成冲击，但短暂的疫情只是改变了需求的时间和空间分布，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需求，也没有改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地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攻坚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升是一项长期目标，但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需求侧所发挥的稳增长的积极作用。我们应该始终坚持从经济发展规律和本原出发，对于任何国家，供给和需求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相互配合，协调推进，在良性互动中平衡发展，始终是宏观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3月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要把复工复产与扩大内需结合起来，把被抑制、被冻结的消费释放出来，把在疫情防控中催生的新型消费、升级消费培育壮大起来，使实物消费和服务消费得到回补。要选好投资项目，加强用地、用能、资金等政策配套，加快推进国家规划已明确的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



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实事求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生动体现，既从复工复产和扩大内需相结合的角度深刻揭示了供给和需求的辩证统一关系，又为我们处理好供给和需求的内在结构平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引。

### ■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能不能打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是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重大考验。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既要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干好自己该干的事，又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原则，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化的机制解决问题。积极发挥政府作用，不是简单地下达行政命令，而是要用全面的、发展的、普遍联系的眼光去看待和分析问题，对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要综合研判，提前预判，科学引导，对于新问题、新变化要及时制定和调整经济政策，分清轻重缓急，精准施策。在制定宏观政策时，要分类别，分区域，分行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外部性特点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措施；在实施宏观政策时，弥补市场失灵和缺位，注重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促进企业复工复产，重点修复断裂的资金链、产业链与供应链，防止疫情出现风险传染和外溢效应，将好事做好。需要注意的是，政府积极发挥作用，不是对市场作用的替代，而是对其修复和促进，尊重市场规律，增强企业在市场供求变化中的主动性和灵活性，避免要素资源错配和市场价格扭曲。

（来源：微信公众号“清华金融评论”，作者：郭威，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财政金融室主任）

[Top](#)

### 【赵晋平：科学谋划自贸区提升战略的实施路径和目标】

“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的新要求。面对全球区域经济加速调整、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新形势，如何科学谋划自贸区提升战略的实施路径和目标，成为当前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 ■自贸区质量水平明显提升

“十三五”时期我国的自贸区建设跨上新的台阶，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 5 年新签署的自贸协定数量明显增加。2016 年以来，我国先后新签了 12 个自贸协定（含已有协定的升级版协定、第二阶段协定和补充协议等），涉及 22 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协定大多数已生效实施。截至 2020 年年底，我国累计已签署的自贸协定达 19 个、涉及 28 个国家和地区。

二是自贸区质量和水平明显提升。在新增的 12 个协定中有 7 个是升级协定或第二阶段协定，涉及 15 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协定在货物贸易降税（零关税）、扩大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范围等方面都有明显提升。

三是实现由双边协定向区域多边协定的重大突破。2020 年 11 月由中国等 15 个国家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由此形成全球最大的自贸区，也是我国参与的第一个高标准跨区域多边自由贸易安排，中国和日本也首次成为同一个自贸协定成员。

四是重量级协定伙伴进一步增加。在新签自贸协定中增加了排名全球第三大



经济体的日本；日本是七国集团（G7）成员之一，也是亚洲地区最大的发达国家。

五是自贸区网络向更多地域延伸。5年来，我国的自贸协定伙伴在已有地域基础上新增了非洲（毛里求斯）和中东欧地区（格鲁吉亚）。截至2020年年末协定伙伴所在地域涉及亚洲、大洋洲、西欧、中东欧、南美洲等广泛地区。

六是循序递进格局基本形成。“十三五”时期正式签署的自贸协定，多数谈判是在2016年之前就已启动的。保持科学合理的节奏和不同进度项目结构对于保障谈判质量和新增成果的连续性稳定性具有重要作用。截至“十三五”期末，我国正在进行的自贸区谈判还有10个。其中，中韩第二阶段谈判和中国—秘鲁升级谈判是已有协定的升级版谈判；已经在达成共识基础上着手进行联合研究的自贸区还有8个，其中包括1个升级版协定（中国—瑞士）。

### ■有力提升区域经济融合度

随着新签协定的不断增加，自贸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日趋显现。

第一，促进对外贸易持续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以“十三五”时期的对外贸易为例，海关统计的计算结果表明，截至2020年我国和已签协定伙伴国（地区）之间的进出口总额占全部对外贸易的比重达到45.8%，比2015年提高了7.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达到41.7%，扩大了4.5个百分点；进口达到50.9%，增加了10.6个百分点。按照可比方法计算，在“十三五”时期的5年间，我国和自贸协定伙伴之间的进出口贸易累计增长了32.3%，增速比其他部分贸易加快2.3个百分点。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升级协定自2016年正式实施以来，双边贸易累计增长了61.5%，增速是我国同期外贸平均增速的两倍。其中，我国对东盟出口增长了54.2%，增速比东盟以外贸易平均增速加快27.3个百分点，仅对东盟出口增长一项，就使得我国2020年国内出口商品生产比2015年净增4701亿元，相当于当年GDP净增0.46个百分点。出口增长为中国企业带来了进入东盟市场的重要机遇和可观收益。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巨大冲击，全球贸易大幅度萎缩，我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逆势增长，东盟也首次成为我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为印证自贸协定在促进可持续和稳定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成功范例。

第二，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助力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

推进自贸区建设是一个国家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促进制度性规则性开放的重要体现。我国已经签署的自贸协定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内容，而且在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经济合作等广泛领域做出了开放承诺，开放的标准和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例如，RCEP协定生效后区域内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更高水平服务贸易和投资准入开放；以及包括市场竞争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跨境电子商务等广泛领域在内的高水平开放承诺。这些对于促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制度性规则性对外开放水平、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将产生重要推动作用。

5年来，在自贸区网络建设带动下商品市场准入开放的生动实践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根据海关和财政部税收统计计算，2020年我国实际关税税率（进口关税/一般贸易）仅为3.0%，比2015年降低1.5个百分点。进一步的测算表明，1.5个百分点中至少0.8个百分点的降幅可看作是在此期间协定关税降税带来的。

不断增加的自贸区降税，对于我国扩大商品市场开放、满足国内生产和消费



对国外商品需要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海关统计并按照可比口径计算，2020年我国自贸协定框架下进口比2015年增长43.3%，高出同期其他类型进口平均增速12个百分点，充分显示了自贸区建设对于扩大国内进口需求的积极影响。

第三，提升我国与区域成员的经济融合程度，形成互利共赢新型合作关系。

自贸区理论和国际经验早已表明，通过建立制度性合作关系，成员之间相互贸易和投资环境明显改善，将会提升区域内贸易比重，增强彼此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减少外部市场因素冲击的风险，维护地区经济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从中国和东盟的10+1自贸区来看，在升级版协定生效实施后的2017年~2019年期间，东盟对华进口占其全部进口的比重由22.0%提高到25.6%；从中国的角度看，对东盟出口由12.4%上升到14.4%。这说明自贸区成员之间的贸易依存度是明显提升的，相互市场开放带来了经济相互融合和贸易依存度上升的积极影响。

另外，2015年~2020年期间，中国从自贸区成员进口累计增长了42.1%，相当于同期出口增速的近两倍，说明自贸区伙伴国从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中获得了更多利益，为这些经济体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对加强我国与自贸区伙伴之间的互利共赢合作关系产生了积极作用。

### ■全球区域经济进入大变革时期

当前，全球区域经济格局进入了大调整大变革时期，具体表现为以下六大特点。一是签署自贸协定成为全球范围内双边及区域多边合作的主要共识和新的潮流。各国吸取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深刻教训，出于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需要，将经济活动布局的区域化作为主要调整方向，各类自贸区的数量仍在快速增加。二是贸易投资自由化覆盖领域明显扩展。不仅涉及传统的货物贸易和市场准入，而且包括服务贸易和市场规则；成员间承诺的开放水平和标准也普遍提高。

三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已经开启吸收新成员进程，随着英国等国加入，将会进一步提升其作为高水平区域贸易自由化安排的影响力。四是美国新政府执政后高调推进和所谓战略盟友之间的联手行动，可能会重启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甚至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自贸安排加快推进，成为这些国家实现规则重构和地缘政治目标的重要工具。

五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推进自贸区建设的力度明显加强。54个国家组成的非洲自贸区进程已经正式启动，其他地区以新兴经济体为主的自贸安排也在不断增加。这些进程的主要目的在于回避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的不利影响，提高国际竞争力和保持经济外交的均衡关系。六是东亚区域一体化出现突破性进展，与欧美等其他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RCEP即将正式生效，中日韩等区域自贸协定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明显提升。

### ■自贸区成为双循环重要载体

“十四五”是我国新发展格局建设的重要时期，自贸区将成为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纽带和载体。自贸区提升战略首先要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自贸区提升战略实施的路径和阶段性目标。

一是将尽快完成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和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作为提升战略实施工作的优先目标，力争实现以双边促区域多边的“牵引”效应，在更高层次的自贸区谈判领域取得新突破。

二是在加强双边战略性对话和协商基础上，研究启动中欧、中英、中美双边自贸区谈判的可能性，以主动实行高水平开放的积极姿态，深化我国与世界主要大国（经济体）之间的双边制度性合作。



三是积极创造条件，大力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自贸区建设，通过机制化合作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效；加强和南美洲、中东欧、中亚、非洲地区国家之间的自贸区研究，做好建立广覆盖自贸区网络的基础性工作。

四是紧密跟踪 CPTPP 扩围行动的可能变化，组织力量对加入 CPTPP 谈判的可能性、时机选择和谈判策略等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并结合我国对外开放总体布局的阶段性目标提出预案。

通过上述努力，力争使我国与自贸协定伙伴之间贸易规模占外贸总额比重由现在的 45% 提高到 55% 左右的水平上。

（来源：《中国改革报》2021 年 03 月，作者：赵晋平，国务院参事室自贸试验区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

[Top](#)

## 虎视寰球

全球化加剧外部冲击的力度，既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又使全球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并导致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和社会等等全方位的矛盾和冲突。如何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化弊为利？从决策的角度，不仅中央高层在殚精竭虑，那些有志于在全球化中冲破重围的企业家和改革家更是殚精竭力。那么，双方如何互动？本栏目力求更多的向大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启发。

### 【英国谋划“后脱欧”时代全球定位遭质疑】

英国政府 3 月 16 日发布一份题为“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国防、发展与外交政策的整体评估”的报告，全面描绘了该国对未来十年在世界舞台所扮演角色的愿景。这份报告被认为是冷战结束以来英国对其世界地位最彻底的一次重新评估，意图在脱离欧盟后塑造“全球英国”的形象，但不少专业人士认为其“抱负与能力”之间存在差距。

#### ■ 设定广泛目标

报告阐述了英国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基本原则，包括多方面内容。报告一方面称北约仍是欧洲-大西洋地区集体安全的基础，英国将继续成为北约内部的主要欧洲盟友，另一方面也明确提出英国外交政策将向印太地区“倾斜”，并称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重心正转向该地区。报告称，为应对其他国家显著增加的、多样化的威胁，形成“最低限度、有保证和可信的核威慑”，英国将把其所拥有核弹头的数量上限从 180 枚增加到 260 枚。

报告还说，英国将建立一个反恐行动中心，统筹政府部门、安全情报机构、执法系统等共同协作，以更好地应对恐怖主义。此外，报告还阐述了其他一系列



目标，涵盖气候变化、经济发展、技术研发、太空战略等，例如确立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战略，将其作为英国的首要国际任务；拟在 2030 年前将英国打造成科学技术超级大国和全球服务、数字和数据中心等。

### ■引来专家质疑

对于这份报告设定的目标，一些专家提出了质疑。英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前驻法大使彼得·里基茨说，报告强有力地宣告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但他质疑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能否“实际发挥作用”。

对于英国意图将外交政策向印太地区“倾斜”，里基茨认为这可能招致欧洲盟国不满。他说，英国向印太地区的“倾斜”同时也是从欧洲的“偏离”，法国人希望在报告中看到英国肯定欧盟对欧洲安全的贡献，但报告会让他们“失望”。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事务副研究员理查德·惠特曼表示，英国对自身愿景充满自信，“但想要成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份报告表明，离开欧盟并没有让国际角色正在减弱的英国学会“反省”。尽管英国在报告中强调将继续致力于欧洲安全与防卫，但有关与欧盟关系长期目标的内容明显很单薄。

惠特曼还认为，英国在这份报告里展示的雄心如何实现还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报告提出的外交议程的规模和范围都需要外交能力的显著提升，而这需要巨大的财务投入才能推动。“真正的考验将在 2021 年之后。”放弃了欧洲这一重要外交平台，英国能否将其对未来国际关系的自信愿景转变为“实现其雄心壮志的新的、更深入的伙伴关系”，惠特曼对此表示怀疑。

### ■核政策备受批评

除了上述质疑，这份报告中有关提高核弹头数量上限的提法在英国国内外备受批评，不少人士认为此举“不负责任且危险”。英国“苏格兰民族党”成员伊恩·布莱克福德表示，该报告显示了“‘全球英国’的品牌到底有多空心”。他质问向国会议员介绍该报告内容的首相约翰逊，是谁给了约翰逊政府权力让其可以背弃英国在《核不扩散条约》中承担的义务。

针对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一档广播节目中有关伊朗核问题和英国增加核弹头数量的表态，英国绿党议员卡罗琳·卢卡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拉布说其他国家的武器扩散使他“夜不能寐”，但就在这之前他还试图为英国核武器扩散作辩护，这种做法是“惊人的虚伪”。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负责人贝亚特丽斯·菲恩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英国改变其核弹头数量上限的决定是“骇人、不负责任和非常危险的”。这违反国际法，也不能解决气候变化和虚假信息等英国面临的真正安全威胁。（据《光明日报》）

[Top](#)

## 【美日澳印“四边机制”面临多重挑战】

3 月 12 日，在美国积极倡议与主导下，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领导人举行视频会议，讨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等问题。此次会议是在美日澳印“四边机制”下的首次领导人级别会议，同时也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参加的首场多边峰会，试图在外交上释放四国团结一致的政治信号，强化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结构，宣示四国共同应对其他大国的战略认同。显然，这将对印太地区地缘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加剧印太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 ■为美国“印太战略”服务



美日澳印“四边机制”最早由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积极推行“印太战略”，强化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将四方安全对话升级为四国磋商机制，积极推动美国与日澳印等国的合作，以构筑全球反华包围圈；煽动、挑唆并激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矛盾，蓄意挑衅中国在南海地区的主权与安全，全方位挤压中国发展空间。美日澳印组成的“四边机制”成为“印太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服务于该战略。

拜登政府上台后，继续推进“印太战略”，明确将战略重点转向印太地区，进一步提升“四边机制”的地位，致力于将该机制作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安排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四边机制”被拜登政府激活和强化，从一个非正式和不定期的四方对话机制走向了最高领导人级别的峰会。根据会议联合声明，四国领导人拟在今年年底前举行面对面的会晤，更深入推进“印太战略”，使美国继续主导印太地区事务，维护其在全球海域的主导地位。此次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针对性和攻击性十分明确，符合美国新政府所强调的通过联盟强化国际战略竞争的意图，会议召开的时机也反映出了美国的精心谋划与战略图谋，体现了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印太地区的重视。

联合盟友和伙伴国共同抗衡中国，已成为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外政策的一大特征。“四边机制”的首次领导人会议，本质上反映了美国竭力联合印太地区盟友与伙伴国推进“印太战略”的意图，即把四国间合作扩大到印太地区，日澳印三国各自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伙伴关系，强化与亚洲国家的外交关系，加强与太平洋岛国合作，并使印度洋地区参与进来，与美国目前的“辐射式”联盟体系等形成战略上的互补，以抵消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 ■ 涵盖议题广泛 各方利益杂处

此次会议讨论了四国在新兴科技、稀土等战略性产业领域的合作，显现出很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四国共同发起一项倡议，针对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自主研发的新冠疫苗，为从根本上抵消所谓中国“疫苗外交”，宣布向东南亚国家提供10亿剂强生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疫苗将由美国和日本资助，由印度企业生产，由澳大利亚分发。此次会议借此拉拢印度，使印度成为最大的实际获益者。

四国领导人还强调共同维持在新兴科技、信息技术、太空等领域的技术优势，讨论了在气候变化、稀土、能源、芯片等关键领域的合作。会议将供应链安全作为重点议题，并确认了分散供应链的必要性，以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四国将联手重组稀土供应链，研发稀土精炼技术，在资金上支持中国以外国家的稀土产业，降低对中国稀土供应的依赖。“四边机制”首次领导人会议讨论的议题十分广泛，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美国新政府将重新全面强化与盟友、伙伴国家的合作。但与此同时，美国实力的相对衰弱，缺乏足够的凝聚力、诱惑力，讨论议题过于宽泛造成的协调难度极大等明显的因素，都使得各国难以简单地选边站队。这是“四边机制”需要解决的重大挑战。

尽管美国试图在印太地区组建“小北约”，但四国在基本战略意图、发展优先事项、对华立场上都不尽相同，日澳印三国出于对华经贸和外交等关系的需要，不会完全与美国站到一起，难以形成有机整体。此外，印美之间的军事合作有着互相利用的特性。美国积极拉拢印度，欲使其成为美国全球战略中遏制新兴大国的重要桥头堡。而印度要的是利用美国印太战略之需提高自己博弈的筹码，同时向美国购买军事技术和先进武器装备，以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据《光明日报》）

[Top](#)



## 【难民潮再成土耳其与欧盟的烫手山芋】

难民问题近来再次成为土耳其与欧盟之间的争议热点。总统埃尔多安近日在土耳其伊兹密尔国际移民大会上表示，欧盟没有履行在难民问题上对土耳其许下的诺言，希腊接纳了 10 万名难民，欧盟就给予 30 亿欧元支持，土耳其接纳了 400 万难民，欧盟却置之不理。土耳其对欧盟未按照约定在难民问题上给予足够资金支持十分不满。

### ■土耳其在难民问题上对欧盟强烈不满

埃尔多安总统近日指责称，土耳其与欧盟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难民危机。欧盟成员国希腊故意击沉驶向希腊的难民船只，进入欧盟的数万名难民儿童不知所终，一幕幕令人羞耻的场景在希腊海岸和欧盟境内发生。他表示，欧盟每次对土耳其所说的都是谎言，承诺的 60 亿欧元援助到现在都还没完全付清。

土耳其外交部副部长亚武兹·塞里姆·科兰日前对当地媒体表示，土耳其是世界上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共计约 400 万难民居住在土耳其，其中 360 万人来自叙利亚。在土耳其出生的叙利亚儿童超过 60 万，同时土耳其政府向超过 900 万叙难民提供了援助。为了向叙利亚难民提供医疗、住房、教育等服务，土耳其政府已经支付了超过 400 亿美元。

欧盟与土耳其 2016 年 3 月 18 日就难民问题达成历史性协议。按照协议，所有从土耳其入境希腊的避难者须在希腊进行登记、提交避难申请，未履行上述步骤或不满足避难条件的非法移民将被遣返土耳其。此外，每遣返一名经土耳其入境希腊的非法移民，欧盟将在境内安置一名滞留在土耳其的叙利亚难民，安置名额上限是 7.2 万人，即“一换一转移安置原则”。同时，欧盟承诺加快土耳其居民进入欧盟的签证自由化进程，并对土支付 60 亿欧元援助。

土耳其外交部近日宣称，欧盟成员国希腊向土耳其强行遣返叙利亚、阿富汗等国难民，土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土外交部称，希腊政府近日没收数十名难民的手机、现金甚至鞋子，并将他们驱赶至土耳其与希腊陆地交界线梅里奇河中的一个 small 岛上，所幸这些人最后被土耳其部队解救。

土耳其 NTV 电视台报道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发言人博利斯·切什科夫表示，希腊近一个月以来向土耳其密集遣返难民的做法明显违反了《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等国际法以及欧盟相关法律，联合国对此感到担忧，并将持续关注事态发展。土耳其广播电视台援引土外交部副部长科兰的话称，希腊在近 3 年时间里违规向土耳其遣返了超过 8 万名叙利亚难民。

### ■欧盟承诺与土耳其加强难民问题合作

为了应对土欧难民问题，欧盟方面承诺与土耳其加强合作。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近日消息，欧盟表示希望与包括土耳其在内的相关国家在移民和难民遣返问题上开展合作，并将视合作进展决定下一步对后者采取宽松或是严格的签证政策。据报道，欧盟驻土耳其代表团团长尼古劳斯·梅耶尔·兰德卢特 3 月 9 日在与土耳其市政联盟主席法蒂玛·沙辛会面时表示，欧盟在 2020 年按照协议向土耳其支付了承诺的 600 万欧元资金支持，这笔资金完全用于协议规定的项目，现在已经到了全面执行协议的阶段。欧盟向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提供职业素质培训、社区协调、就业保障、儿童教育、校园建设以及医疗保护等方面的支持。欧盟还将在土耳其东南部边境城市加济安泰普建设难民项目中心，叙利亚难民和接收难民的当地社区都将获益。兰德卢特表示，对土耳其政府和人民在接待世界上最多难民人口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努力给予赞赏。



同时，欧盟期待与土耳其重建互信关系。土耳其《共和国报》报道说，兰德卢特在会见土耳其官员时表示，受各种因素影响，欧盟与土耳其的关系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期待未来数月内双边关系得到提升，至少能在某些特定领域加强合作。为此，双方应提升互信，这是采取其他有利步骤的前提。

### ■土欧改善关系的需要与障碍

虽然土耳其在难民问题上对欧盟强烈不满，土耳其与欧盟成员国希腊之间在难民问题上剑拔弩张，但土欧双方具有合作的基础和需求，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欧盟前驻土耳其代表团团长、法国外交官马克·皮埃里尼近日在卡耐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网站上发文称，土耳其和欧盟都依赖和需要对方。一方面，德国以及意大利、西班牙等地中海周边国家众多的土耳其裔与土耳其经济往来密切，不希望土欧关系继续下跌。德国、保加利亚和希腊等国则惧怕再次出现难民潮，希望与土耳其建立稳定、可预见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土欧关系恶化，进入土耳其的外国直接投资出现大幅下降，一些欧洲投资者撤离土耳其市场，土耳其无法承受与欧盟关系全面恶化的后果。

皮埃里尼称，虽然土欧双方都无法承担关系破裂的风险，但仍有大量现实问题横亘在双方之间。在外交方面，除了一直以来困扰双方的难民问题，还有土耳其与希腊在东地中海的油气资源争端、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等地区的军事存在等问题。在内政方面，欧盟一直批评土耳其的民主和言论自由状况，诟病土政府威胁关闭部分反对党的做法，不满土政府处理土耳其海峡大学师生抗议事件的方式，不赞同土耳其退出旨在保护女性权益的《欧洲委员会防止和反对针对妇女的暴力和家庭暴力公约》的计划。

此间媒体普遍认为，土欧双方将以难民问题为筹码，重点讨论援助资金和签证便利化问题。土耳其希望欧盟尽快支付援助资金，并按照协议加快土耳其公民赴欧签证便利化或者免签进程。欧盟方面则将视与土耳其进行难民问题合作的进展，决定对土援助和签证便利化进程。欧盟领导人峰会即将于3月25日至26日举行，届时欧盟与土耳其之间的移民问题将是重要议题。（据《光明日报》）

[Top](#)



## 华夏透视

善于学习的人懂得把观察、经验和知识转化为智能并使用得当，不仅能把梦想持之以恒，更懂得如何事半功倍。投资大师巴菲特在给其老师本·格雷厄姆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所写的序言中说：“长年进行成功的投资并不需要极高的智商、罕见的商业洞见，或内部消息。真正必要的是做决策所需的合理的知识框架，以及避免情绪化侵蚀智识的能力。”本栏目力图提供一个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的框架，从而达到把握最关键、最重要的决策信息和决策要点的效果。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和分析也将因此得到升华。

### 【经济增长的张力从何而来：政治治理与经济转型】

借用理查德·戴维斯（英国央行经济学家）提供的案例，经济增长的张力是由以下因素共同决定的：政治治理；动态转型能力；城市化；以及动态的技术进步（科技创新）。

#### 一、关于政治治理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从理论到实践，其基本的发展趋势是政府（最初是君主）的权力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从无限权力变成有限权力，从负面清单变成了正面清单，从天赋权力变成了人民授权。古希腊推崇的是精英政治；古罗马经历了从共和到集权、从世俗政治到政教合一的政治治理的演变，起源于古希腊的精英政治也就随之蜕化成为集权政治；从1215年的英国大宪章运动到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了限制君主（政府）权力的政治改革，这一改革顺应了发展贸易和市场交易的经济需要；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以及随后由法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启蒙运动，把政治治理推向民主和宪政，尽管历史学家和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对法国知识分子所崇尚的理性是否有助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良性演进持有异议，但很少有人对政治治理走向民主和宪政持有反对意见。

民主与宪政为何重要，因为它增加了人们的自由权力，扩张了市场的边界，并可迫使政府从攫取型的变成普惠型的与服务型的，通过合理界定市场和政府作用的边界，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张力。所有这些基本上都得到了实证的支持。从历史上看，文艺复兴后获得更多自由的意大利人在地中海贸易中脱颖而出；受新教运动影响最大、在当时欧洲政治统治最为宽容的荷兰成为远洋贸易大国，相反，处在集权政治统治下的西班牙虽有远洋却没有自由贸易，最后未能崛起；英国则通过君主立宪成为世界首个工业化国家。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当代社会，二战结束以后，东亚国家先后走上了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但是，最后成为高收入发达经济体的也就只有少数几个发生了政治治理结构民主化改革的经济体，比如日本（1946年的麦克阿瑟“宪政改革”）、韩国（1980年光州起义后从军政府到



民选政府的转型）、中国台湾（1986年开始先后开放党禁和报禁），还有推行多党制与普选制的新加坡等。凡是没有发生政治治理与经济增长良性互动的国家或者经济体，最终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停滞不前，有些国家还不幸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 2011 年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了更为令人信服的结论。经过回归分析，在一个以民主程度指数为横轴、人均收入为纵轴的直角坐标系中得到了一条从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的“耐克曲线”。横轴民主程度指数的计量采用的是四个制度代理变量，它们分别是：中央集权、混合政权、有缺陷的民主，以及完全民主。从靠近坐标原点的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的“耐克曲线”表明，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程度与经济发达水平高度正相关。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比如在政治民主化程度很低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也出现了少数几个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从样本国来看，主要是中东石油出口国，尽管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可以与发达工业化国家比肩，但由于其糟糕的政治治理结构，这些国家收入分配的极化效应极为明显，财富基本集中在王室成员手里。更何况，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基本没有张力，其国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几乎完全取决于石油储量，以及石油价格的波动。

## 二、关于动态转型的能力问题

为什么需要转型，是因为原来的政治治理结构或者经济结构已经失去张力，导致经济增长走向衰落，甚至完全没有了韧性。动态转型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它通常会遇到以下因素的阻挠：一是路径依赖；二是经济粘性。这两个因素有时可以单独发生作用，有时则可共同发生作用。路径依赖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路径依赖的主要成因是来自于既得利益者对改革或者调整的阻扰。既得利益者在旧的治理结构或经济结构中投入的资源越多（这在经济学中被定义为沉没成本）、获利越高，就越容易反对任何走向新的治理结构或者经济结构的改革与调整。

粘性从物理学的定义来讲，是流体的一种宏观属性，表现为流体的内摩擦。如果将其应用于社会治理与经济活动，那就应当将其理解为改变本身的困难，而不是存在于路径依赖中的改变的困难。改变本身的困难是指改变发生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成本（也就是物理学所说的摩擦力），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重置成本”在政治治理的结构转型中，英国与法国提供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

英国在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选择了君主、旧贵族与新兴资产阶级妥协的君主立宪改革方法，1689年通过的《宽容法案》实现了宗教和解与权力分享。这一改革方法之所以获得了成功，是因为它大大减少了既得利益者的沉没成本，并让既得利益者也可以分享新制度带来的红利。但是，由于英国的这种渐进演变留下了太多的传统，对英国日后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便是旧制度留下的贵族价值体系，受这种价值体系的支配，英国资本家巴望着最终融入更受尊重的“绅士”乃至贵族那样的更高阶层，一旦实现这样的目标，他们就停止奋斗了，而英国残留的等级体系也巴不得要接纳他们，以便使得自己的存在显得更有价值。因为有这样的体系存在，英国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性很差，从而也更加向往可以突破这种等级体系的新大陆而纷纷移民北美，而在英国本土也因为企业家精神的衰竭而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张力。



法国的情况则要糟糕得多，如果说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因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而造成的，那么发生在1848年的法国大革命则属于“平民造反”。其中，有两个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是法国统治者的绝对短视，他们居然会抱着“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这样的想法去占有与挥霍法国民众创造的财富，这不仅让法国经济增长失去了张力，而且还丧失了至关重要的韧性，于是，刚性的革命就是必然的了，其结果就像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夫人所说的那样，“我们死后，将会洪水滔天”，大革命的滔滔洪水将法国社会冲了个底朝天；二是法国浪漫主义知识分子所推崇的启蒙运动误导了法国社会的变革，将真正需要的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重农主义（法国的重农主义想要建立的不是一种有生产力的经济体系）向重商主义的转型导演成为一场旨在追求平等的革命，其结果只能是悲剧性的。

没错，平等是人的自然权利，但是政治或者政府的基础不可能是自然权利，当把革命的目标定义为平等时，所有会造成不平等的因素都必须加以剥夺，于是最容易造成人与人之区别的“自由”和“财富”就必然会成为革命所要剥夺的对象。革命对法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雨果看到了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人性的丧失。托克维尔观察到革命并未带来平等，但却实实在在地剥夺了人们的自由，至此，自由与平等能否兼容就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埃德蒙·柏克则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反思法国大革命》2014年中文版）发现了暴力革命与专制统治的历史定律，后人以其名字命名，将此定律称为“柏克定律”：“毁灭性的破坏终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的出现，唯有它才能够维持社会免于全面的混乱和崩溃”，“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现代政权，唯有接续上本国本民族之政治文化传统，回到秩序和传统的轨道上来，方能繁殖养育，长久发展”。

由此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法国因为革命而导致转型失败，法国没有能够像英国一样通过转型走向工业文明。革命为何会导致转型失败，因为从本质上来讲，革命只是一种权力再分配，革命就是通过权力再分配来实现财富再分配，它没有进化，只有破坏，凡是以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底层居民贫困的民族，最终都无法走出旧制度，相反，会更加容易陷入一个不断革命的“熵循环”，这就是在我们的历史发展中经常可以看到的现象，“天下皇帝轮流做”。法国大革命失败导致法国未能成为第一批工业化国家，法国的重新崛起靠的是拿破仑以后软弱的政府与周边资本主义发展。

在比较英国与法国的社会转型之差异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评说：英国社会转型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将自由置于优先地位，而法国社会转型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拉丁人将平等置于优先地位。这种看法恰好是把因果关系给弄颠倒了。正确的因果逻辑是：就英国来说，是政治治理结构的改革造就了自由；对于法国来说则是不平等带来了革命，但是革命未能带来平等，反而消灭了自由。总之，英国社会转型成功是因为它有能力完成这样的转型，能力源自一个新兴阶级的崛起；法国社会转型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没有这样的能力，法国始终缺乏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体系的资产阶级，由浪漫主义的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合力所推动的一场社会变革，只能是权力与财富再分配的革命。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来分析经济转型的问题。我们这里所说的经济转型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体制层面的转型；二是经济或者产业结构的转型。前者关系到整个社会，后者所涉及的主要是某个地区（城市）或者部门。

从经济体制的转型来看，中国是成功的，俄罗斯是失败的。中国与俄罗斯所面临的问题都是从低效的计划经济转向有效的市场经济。但是，中国因为有能力



而完成了转型，俄罗斯却因为没有能力而导致转型失败。关于经济体制转型的文献浩如烟海，但大量的研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经济体制转型的方法与路径上，而不是能力上。于是就把问题引向激进改革好还是渐进改革好，以及何种改革的线路图更优等问题的讨论上，至今未能形成共识。但是从中国、俄罗斯以及中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来看，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功与失败主要取决于能力。能力来自何处？仍然是本文所反复强调的自由与财富。

同样是计划经济，中国与作为俄罗斯前身的苏联有很大的不同。从国内经济来看，前苏联是完全的计划经济，而中国则是不完全的计划经济。从外部的国际环境来看，前苏联与美国处在冷战状态，而中国则处在两个体系之外的第三世界。这两个区别使得中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的能力远远超过俄罗斯。

中国不完全的计划经济导致中国长期存在体制外的力量，通过非正规市场的交易保持了中国经济的韧性，保留了可贵的经济自由，并造就了一批潜在的“企业家”，一旦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部分力量就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来确保转型的成功。中国不参与美苏两国之间的冷战，那就没有把财富耗尽在军备竞赛上，尽管存量财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但在转型后的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绝不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是值得赞赏的。

前苏联属于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体制外的力量。在国际上与美国处于冷战状态，大量的财富被用于军备竞赛。经济增长的张力与韧性尽失，这既是导致前苏联崩溃的原因，也是造成俄罗斯没有能力完成经济转型的原因。至于俄罗斯所采取的激进改革方法，虽然不是决定转型成败的关键所在，但是，在其转型能力较差的情况下，采取激进的转型方法，那就会大幅提升其转型失败的概率。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转型能力越差，越需要放慢改革的步伐，以防止存量财富在快速转型中的流失，并等待市场力量的崛起。激进的俄罗斯 500 天转型方案，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犯了像法国大革命时代浪漫主义启蒙派知识分子一样的错误。当然，激进改革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比如与俄罗斯采取同样的激进改革方法的中东欧国家，就有不少成功地实现了经济体制的转型。如果把成功转型的部分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做个对比，其中关键的差别在于是否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的国家为何会比封闭经济国家更加容易获得转型的成功，原因在于对外开放可以增强经济体制转型的能力。随着对外开放而来的外国企业和资本的进入，既可带来财富总量的增加，又要求更加自由的经济环境，从而可以带来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良性互动。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东欧国家可以实施对外开放型的转型，俄罗斯却不能呢？从历史上来讲，部分中东欧国家原本就属于西方（奥匈帝国成员国），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前苏联“解放”了，一旦“共产主义”解体，冷战结束，它们很自然地就会回归西方，所以向西方开放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就不一样了，它原本就不属于西方，又是冷战的旗手，与西方在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关系很难在一代人之间获得缓解，因此，试图通过大规模对外开放、引进外资（跨国公司）来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路径依赖对经济转型的阻扰作用。

据此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经济体制的转型能否成功，首先要看转型的能力，其次才是转型的方法。在转型能力较差的情况下，通过对外开放来借力是种明智的做法。转型能力之大小主要取决于自由和存量财富。转型方法的选择则需要根据转型能力的大小。不管采取何种转型方法，成功的转型都需要有“稳定器”。渐进改革的稳定器是本土的企业家，激进改革的稳定器是外来的跨国公



司。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带来增量收入的增加，保证让所有人都可以通过经济转型而获利，这被经济学定义为帕累托改进。当然，在实践中我们是很难区分渐进改革和激进改革的，所以改革与开放互动、激发本土企业家精神和积极引进外来跨国公司的有机组合，可能是保证经济体制转型成功更为可取的做法。在这方面，中国确实做到了，所以也就成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功国家。接着我们来讨论经济结构的转型问题。经济结构转型可以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种是趋势性的；一种是周期性的。比如，从农耕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化社会所发生的经济结构的演化就是趋势性的；而发生在制造业中的主导产业的结构变化则是周期性的。

趋势性的经济结构变化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结果，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理解这一点很重要。优先发展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往往会走向失败，原因就在于这种做法完全颠倒了趋势性经济结构变化的因果关系。试想，假如没有制造业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哪来的生产性服务和消费性服务的需求，没有需求又哪来的服务业的增长。由此可见，服务业发展的“滞后”是可以理解的，而优先发展服务业则肯定是错的。

在趋势性经济结构的变化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是，伴随着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总量中占比的不断提高，经济增长会趋于停滞，收入差距会趋于扩大。服务业发展为何会造成经济增长的停滞？因为服务业大都不能带来存量财富的增长（消费与供给同时进行、不能储存和积累），不仅生产率低（影响收入的增长），而且大都具有非贸易品的属性（贸易是经济增长中极为重要的发动机）。服务业占比提高为何又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因为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加容易产生收入分配的极化效应。制造业的基本特征是，对人力资本要求比较匀质，工作捆绑不存在极化效应，因此，在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时期，收入分配相对均等，测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一般都较低。但是，服务业就完全不同了，服务业所聘用的要么是教育程度很高的医生、律师和金融等从业人员，要么是教育程度要求相对或者绝对较低的售货员与物流工等，这很容易产生收入分配的极化效应，进而导致全社会“基尼系数”的上升。目前世界各国中（包括一些国际性大都市），凡是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上两大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推进趋势性经济结构的转型呢？优先发展服务业的策略是不可取的。在适时进行趋势性结构转型的时候，最好把生产性服务业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原因在于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提升制造业的竞争力，带来供给和收入增长，它对制造业的发展所产生的是互补效应，而不是替代效应。更为重要的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和产出大都可储存，从而可以增加存量财富，促进经济增长，且不会造成收入分配的极化效应。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满足人们非物质需要的服务业当然也需要发展，因为这可以增加人们的自由度，但应避免将过多的资源与财富用于发展几乎没有多大社会溢出效应的“服务业”，医生和律师这些服务都是有社会溢出效应的，然而纯粹的金融交易就没有这样的溢出效应，它的过度发展会造成金融不稳定性，并造成收入分配的极化，既不利于经济稳定、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最后，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分享由趋势性经济结构转型所产生的红利，提升国民的教育水平极为重要，因为这可以让更多的人进入到更高生产率的服务业来增加收入和财富。

现在可以进一步来讨论周期性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这个问题对经济结构较为简单的小国、特定的区域或者城市来说显得特别重要。我们随手就可得到大量



的例证来证明，对于一个小国、一个特定的经济区域、或者一个特定的城市，假如不能及时地进行周期性的结构转型，等待它的命运只能是走向衰落。比如英国的格拉斯哥、美国的底特律与铁锈带、南美的阿根廷、阿拉伯中东等等。

在讨论经济结构转型这个问题上，我们当然需要把金融加以抽象。在把金融加以抽象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造成经济结构周期性波动的微观基础是产品的生命周期。当产品的生命周期进入衰退期之后，投资就会走向报酬递减，经济增长就会缺乏张力。这时就需要依靠企业家的创新来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至于政府干预，不管是扩张的财政政策还是扩张的货币政策，其作用都是为了稳定当下，而不是走向未来，故而对经济结构的周期性转型没有太大的作用。企业家的创新最初是个别的，然后演变成为丛生的，这时一个新的主导产业便会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周期也会随之开启。人们喜欢把这种变化称之为“产业革命”或者是以康德拉基耶夫名字命名的“长周期”。

在周期性经济结构转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不同情况造成了某个国家、地区或者城市的经济失败：一种是周期中被替代；另一种则是被周期所淘汰。第一种情况的典型例子是格拉斯哥和底特律，第二种情况的案例则更多了，南美阿根廷、中东产油国、美国的铁锈地带，以及中国的东北等不胜枚举，但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日本。

英国的格拉斯哥是一个以造船业为主的工业城市，由造船业带起来的产业链排斥了其他产业的存在，导致其产业结构单一，因此，该城的经济其实非常脆弱。最后因为不能在产业组织和技术上进行创新，而被日本所替代。首先，造船业是一个明显具有规模经济的产业，但是格拉斯哥的造船业却由数十家没有规模的中小企业在分散制造、过度竞争。与此相反，战后的日本在把二战中用于军工生产的造船业改造成为生产民用船舶的大公司以后，迅速获得了规模经济，从而在产业组织上超越了英国的造船业。其次，在技术创新上，英国格拉斯哥的造船业又连输两城而败给了日本的造船业：一是当日本开始用平台新技术造船的时候，格拉斯哥却还在沿用其创业初期形成的沿着河海岸斜坡造船的旧技术，其施工效率就要比日本低得多；二是当日本开始使用焊接技术造船的时候，格拉斯哥却还在继续使用传统的铆接技术，这又大大影响了船舶的质量。最终，日本完胜，英国造船业全线崩溃，作为英国工业化时代最为重要城市的格拉斯哥也因为经济结构单一（以造船业为主），在失去张力之后，又没有韧性而随着造船业的崩溃迅速走向衰落。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的底特律。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被周期淘汰的案例就更多了：阿根廷因为坚持单一的农产品出口（向土地寻租）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东产油国（向自然寻租）也是因为经济结构单一而无法走上工业化发展的道路。以上两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因为不能走上工业化发展的道路，连周期都不能进入，因此，随着创新与产业革命周期的不断演进，它们就被世界经济的发展远远地甩在了后头。美国由芝加哥、底特律和匹兹堡这个铁三角组成的工业区则因缺乏经济结构的转型能力而成为“铁锈地带”。这个曾经以钢铁、汽车和机械制造为主导产业的地区，在高科技产业的冲击下逐渐走向没落，其转型之困难在于以上列举的这几个主导产业（钢铁、汽车和机械制造）都会产生庞大的“沉没成本”，以致无法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而走向新的周期。在“沉没成本”数量巨大的情况下，新的资本和产业是难以进入的，因为那些已经“沉没”的资本或者要素最终是会稀释或者消耗掉增量资本和要素的，在“腐尸”上创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沉没成本”的生锈，这个地区最终也就变成了举世闻名的“铁锈地带”。中国的东北在经济结构转型时所遇到的困难不仅是经



济结构上的，同时也是体制结构上的，因此其经济结构上的转型特别困难。从经济结构上来讲，中国东北与美国的铁锈地带非常相似，也是以钢铁等重工业为主，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沉没成本”。但是，中国的东北又存在着与美国铁锈地带不同的体制问题，那就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和企业国有所造成的糟糕的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的短缺，最终演化成为一种“吃租经济”，普通的劳动者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离去，要么等待政府的补贴，各级政府则消极等待来自于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所以，中国东北在经济结构转型上要想取得成功，首先得有体制“解锁”，其次是要尽可能释放“沉没成本”，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具有前瞻性的决策、走向未来。

最后，还有必要对日本这个典型案例单独加以分析。日本的经济增长经历了一个非常标准的结构演化过程：随着农民不断离开土地，脱离农业来到城市，成为生产率更高的工业劳动力，工厂也开始加大投资力度，通过升级改造生产盈利性更强的出口产品；随后，它们陆续从纺织业转向钢铁制造，又从钢铁制造进入平板电视，汽车及化工制造等更多领域；随着工厂在城市不断集聚，与制造业一同出现的中产阶级群体日渐增多，于是，从餐饮到保险，服务业开始繁荣起来，以满足这个新兴阶级的切身需求；此时，制造业让位于服务业，但是服务业对厂房与设备的投资远不及制造业，于是经济开始萎缩，至此，日本经济增长的张力已经没有了，余下的就靠经济增长的韧性了。

这个路径还能改变吗？很难！原因在于日本已经取得的工业化发展成就基本上都是学来的，日本一旦通过学习进入技术前沿，便会因为缺少原创能力而失去转向新的经济周期的能力，从而被淘汰出局。日本为什么会缺少原创能力呢？日本能够在亚洲率先走上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是因为日本首先实现了体制“解锁”。对此，曾经访学日本的傅高义通过对比拉美和日本找到了其中的原因。根据傅高义的分析，拉美社会的精英受益于旧体制，拥有大片的农场和种植园，生活舒适悠闲，不思进取。日本的精英接受过良好教育，但并非地主，对旧体制毫无留恋，他们的抱负是国家的赶超和繁荣富强。两国精英们对旧体制的不同立场和态度导致了日本体制转型的成功与拉美体制转型的失败。

但是，尽管日本的体制转型成功了，然而日本的经济结构转型则并不成功，稻盛和夫就其原因做了这样的解释，日本民族属于农耕民族，日本人的习性就是忠实地遵循自然四季的变迁，周而复始地进行相同的农业作业。如果不是这样，违背自然，就将难以生存下去。因此，忠实地依照自然界的规律，扎扎实实工作，反反复复努力，就是最好的生存之道。所有这些，决定了日本人基本没有超出常规的、独创性的飞跃性思考能力。自古以来，在日本，一切新鲜的事物都是从外国引进的。日本人心灵手巧，擅长改良改善，把外来之物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也就是说，只有日本才有的、独特的文化或技术并不存在。

日本大学的失败更是强化了日本社会的这种特征。日本把大学变成了年轻人学习的地方，而不是学生自我发展的地方（这才是大学的真正价值），大学一旦成为学习的地方，便无法造就适合于未来的人才，因为可以学习的知识仅代表过去，很快就会失去实用价值，且会导致学生对实验没有兴趣，进而失去好奇心等，结果日本的大学大都成为向日本大公司输送合格员工的“培训机构”，而没有能够像美国的大学那样成为科技原创的中心。

时至今日，日本经济已经没有张力可言，索洛增长的边界因为人口老龄化而难以扩张，罗默增长的边界则因为缺乏原创能力同样无法扩张。但是日本不会“死去”，因为日本有经济增长的韧性，日本经济增长的韧性在于城市化。



### 三、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城市化是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张力的。城市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城市有自由，因为它基本上不存在农村那样的血缘与宗法的统治。城市的经济增长是超线性的，从而优于线性的增长，城市经济的这种增长特性带来两大乡村经济所没有的优势：一是报酬递增；二是非常长期的生命周期。

城市经济的报酬递增效应源于马歇尔所说的聚集效应。聚集效应主要来源于现代工业生产在空间上的集中与距离上的彼此接近所带来的好处，马歇尔把这种好处归结为以下三大聚集效应：多元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技术溢出，以及产业链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生产。以上三大效应不仅带来了马歇尔所说的范围聚集与报酬递增效应，而且大大彰显了城市经济增长的张力。

城市为何会有非常长的生命周期呢？美国物理学家韦斯特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韦斯特认为人的生命周期与企业的生命周期都是有限的，但城市的生命周期却要长得多。原因在于人的生命周期曲线和企业的生命周期曲线都会随着“规模”扩张而从最初是超线性的变成线性和亚线性的，但是城市的生命周期曲线则往往会随着规模的扩张而变成超线性的。比如人老了，新陈代谢率会降低，细胞再生能力会下降，最终导致器官衰竭，走向死亡。企业规模扩大了，企业管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管理投入就会递增，管理的能力跟不上因规模扩张后产生的复杂性，这个复杂的系统就会因为无序的反馈而趋于瓦解或者崩溃。但是，城市经济就不一样了，根据韦斯特的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扩张所产生的成本是递减的（属亚线性），而城市规模扩张所产生的收益则是递增的（属超线性），这种趋势几乎长期不变，以致城市可以拥有很长的生命周期。

马兹达·阿德里在《城市与压力》一书中又进一步对城市发展中的线性问题做了更为仔细的分类，他认为在城市经济发展中，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张，在注册专利数、收入、艾滋病传播、犯罪等方面的增长率都为超线性的，它们平均要比线性增长高出 15%，导致这种报酬递增的原因在于城市经济发展中特有的、社交网络的乘数效应，而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生活在城市经济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乘数，除非他拒绝一切社交，当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能源消耗、水电消耗的增长率则是线性的；而加油站数量、公路网、有轨交通或电线铺设等基础设施的增长率则是亚线性的，其平均增长率要比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率低 15%。

综合以上三种不同线性的增长率，我们可以发现，城市规模扩张所带来的产出是超线性的，而其成本大都是线性（能源与水电消耗）与亚线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则基本上都是亚线性的），在城市扩张的成本中，只有疾病传播和犯罪率少数几项是属于超线性的。把城市扩张带来的成本与收益做成一张城市经济的“资产-负债”表，那么不难发现，在这张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增加速度远远要快于负债增长的速度。据此可以得到几个基本结论：城市经济规模报酬递增，城市生命周期接近无限，城市经济张力强大。正因为城市经济具有以上特征，所以城市化势不可挡，世界现有城市人口已经占到世界总人口的 50% 以上，根据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到 2050 年世界城市人口将会达到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以致我们可以这样说，世界正在变成城市。

有必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是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但也有不少数量的城市未能走上超线性发展的道路，从而遭遇了“城市失败”。大部分走向失败的城市都违背了韦斯特原理，那就是没有实现城市经济本该有的产出报酬递增与成本



投入递减的超线性增长。导致城市经济未能实现超线性增长的原因在于：

第一，产业结构单一。对于这样的城市来说，当一个主导产业消失时，便会给城市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主导产业的消失会导致马歇尔所说的劳动力、技术与供应链这三大聚集效应的消失，最终导致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正外部性的枯竭，比如上文中分析过的格拉斯哥以及底特律就是这样的典型城市；

第二，没有工业。工业消亡是一种经济上的失败，没有工业，就只有依靠服务业、房地产和金融（当然并不是每个城市都适合金融交易的），其后果大都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增长衰退，在这方面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三，缺乏自由。包括人口的自由流动、信息的自由流动，以及自由的思想。城市因为是自由之地，才胜过乡村，才创造了工业文明。所以城市与自由须臾不可分。从实践中看，失败的城市大都是不自由的城市。首先，就像地理学家威廉姆·迈耶所指出的那样，在专制集权国家，人口流向城市是不自由的，因为人口向城市集中会增加政治反对派和发生动乱的可能性，人口不能自由流向城市必造成城市规模不经济。

其次，当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或者体系结构不合理，就会造成极高的通勤成本与面对面交流的成本，这样就会丧失城市最为重要的社交活动，社交活动是一种产生新思想、新知识的活动，它带来头脑风暴、信息交流与知识溢出，是城市经济报酬递增的重要源泉。

最后，错用互联网的城市会面临巨大生存危机，互联网平台用线上交易取代了线下传统的商业活动，从而让城市归于萧条。城市除了让人工作之外，还得让人可以生活，并且必须是丰富而又有趣的生活，其中消费购物是丰富而又有趣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了消费购物的乐趣，城市的吸引力就会大大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在互联网经济的冲击下，当人们居家办公和购物消费时，那么作为城市最为重要的社交活动与面对面对的交流也就会随之消失，于是，头脑风暴偃旗息鼓、信息交流碎片化与数字化、没有知识溢出只有算法偏见，城市就将从一个大熔炉变成一个空间密集的“现代村庄”与“钢精城堡”，天空下已无经济增长的张力。为了避免城市的失败，为了实现城市经济增长的张力，城市发展必须多元化，城市必须拥有强大的工业，最为迫切的任务则是要迅速拯救那些已经被置于互联网统治下的城市。

#### 四、动态的技术创新

什么样的动态技术创新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张力呢？这需要对不同的对象主体加以区分。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只要能够提高生产率或者产品品质的创新就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凡能实现超线性发展的创新都可以获得经济增长的张力；对于一个小国而言，不管是工具体系创新还是最终产品创新，只要能够进入国际技术前沿，便可获得经济增长的张力，比如专事国际软件分工的爱尔兰，以及理查德·戴维斯在《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一书中极为推崇的、依靠芬兰而进入国际资讯产业前沿的爱沙尼亚。

但是，对于大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来说，仅有工具体系的创新是不够的，还必须要能够推动经济周期向前演化的最终产品的创新。提高生产率与产品品质的创新可以为企业带来竞争力、提高利润率，但不能推动周期演化，在市场需求既定的情况下，不过是产能与利润在异质企业间的一种再分配。城市经济中能够带来超线性增长的创新不一定可以开启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假如城市的各种创



新带来的是城市活力、自由与收入的增加，那么它主要改变的是人口在乡村与城市的分布，当然由城市创新所造成的自由活力很有可能成为推动新周期的最终品创新的促进因素。工具体系创新主要是用来提高生产率的，并且经常会产生再分配效应或者替代效应，比如用蒸汽机替代手工织布机，用内燃机替代蒸汽机，用流水线替代单机作业，用多维互联网替代单维的有线通讯等。但是，只有最终品的创新才能满足人类未被满足的需求，才能通过增加消费的基数效用、改变消费的序数效用来扩大市场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不是再分配效应或者替代效应，而是增长与收入效应，经济增长的张力由此而生。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张力的创新只能是可以把经济增长引向新的周期的最终品创新。从纺织品到家电、再到汽车、直至今天的个人电脑和手机，最终品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增长的张力，以致世界经济中每一次长周期的演变所带来的结果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向着更高生活水平的升华与进化。

### 五、一个简单的总结

最后，我们将以中国为例，对以上各节所讨论的问题作个简单的总结。中国是一个非常具有经济韧性的文明，从而导致中国成为世界上文明未曾出现断层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韧性来自于大国的规模经济，特别是各朝政府都无法将之彻底剿灭的自发性非正规市场。即使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走上了中央集权的道路，但没有一个朝代拥有这样一种能力，用“组织”对市场进行完全的替代，从而将市场力量彻底剿灭。相反，任何一个朝代，只要竭尽全力、耗尽资源去消灭市场力量，经济韧性就会随之消失，等待它的必定是刚性的帝国覆灭。

随之而来的新王朝，将会基于历史的记忆或者现实的困难，采取各种各样有利于经济复苏的“新政”（当然不是新的文明）来恢复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复苏。简单地讲，就是赋予人们更多的自由，放松对市场的管制，直至让市场交易合法化。在这方面，唐宋两朝做的相对较好，从而造就了中世纪中国的繁荣。并把中国文明发展的曲线推到了最高点。随后的各朝在文化上越来越保守（重农）、在政治治理上越来越集权，这既与统治者的身份特征有关，也与外部入侵（早期是北方游牧部落，中世纪之后是西方的工业文明）有关，于是经济复苏的能力几近消失，从而导致中国文明发展的曲线由高点向低点的跌落，直至近代被西方所超越。虽然中国的文明发展没有出现过断层，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张力却发生了一个由盛转衰的演变过程。从夏商周到秦汉隋，中国经济增长的张力主要依靠外在的领土扩张（可参见中国历史地理的动态变化），并通过建立大一统的帝国，获得大国经济的优势。唐宋（宋朝的国土面积相对于秦之后的各个主要朝代是最小的）两朝则主要是依靠分权（赋予人们更多自由）和正规与非正规的市场交换制度（包括内贸与外贸），把中国推向盛世，并且达到世界高点。但是在元朝之后，中国便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张力。从国家的政治治理上来看，元清两朝是种族主义的，这导致大部分被异族统治的人们是没有自由的，而明朝的统治则是高度集权的，明朝的皇帝通过剥夺“相权”、“将权”和“言权”把精英治理变成了个人独裁。从国家治理的理念上来讲，重新回归保守的“重农主义”，反对包括内贸与外贸在内的商业活动。最后，历史地形成的、把“帝制”（源于秦朝）、“儒家文化”（源于汉朝的独尊）与“科举制度”（源于隋朝）三者捆绑在一起而形成的布罗代尔“钟罩”又弱化了中国文明转型的能力。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当“帝制”、“儒学”与“科举”三者被人为捆绑在一起的时候，便会产生强大的“正反馈”效应：“帝制”通过儒家文化的“形而上”成为正统；“儒学”通过“科举”而成为圣典；“科举”把所有知识分子变成维护“帝制”与“儒学”的既得利益者。这种正反馈效应导致内生性经济张力的匮乏，唯有依靠外生性的张力来推动经济增长，要么是依靠领土和人口的规模扩张，要么是依靠体制外贸易或对外贸易。当蒙古人入侵导致中国人口减少，当明朝政府重农抑商、紧缩通货、禁止海洋贸易，当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割地赔款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张力几乎消失殆尽。于是中国文明发展的轨迹就像一条抛物线，经由夏商周和秦汉隋慢慢升起，在唐宋两朝达到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高点，然后在元明清三朝期间逐渐下沉。

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1919年的“五·四运动”废儒学兴新学，从而释放了自由和市场力量，并且有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文明开始了从农耕向现代工业化的转型。其中，各种思想学说、各种政纲、各种转型道路之争辩此起彼伏。直至1978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对内改革建立正规的市场经济制度；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于是，我们既获得了内生性的经济增长的张力，又获得了外生性的经济增长的张力。如果我们能够彻底践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强化市场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新体制的建设，我们不仅会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总量，而且也会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中国文明的发展也将会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舞台。要到达这样的境界，我们一定要走出历史，而不是重新回归历史。

*（来源：澎湃新闻网，作者：华民，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Top](#)

**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我们的客户——  
提升竞争优势，共同创造持续长远的收益**